

阅 读 声 明

您现在所阅读的这本电子图书由“风暴轻狂”制作出品。

本书版权归作者所有，“风暴轻狂”只负责制作发行工作。在保证原书内容完整的情况下，您可以对本书进行转载。如果您愿意，我们很乐意您在转载的时候写上我们网站的名字。

如果您需要使用本书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用于某种商业用途，请联系作者，在征得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您可以继续您的行为。但如果您没有征得作者同意而擅自用于某种商业目的，“风暴轻狂”将不对此负任何责任。如果您有意出版您的作品，或者您有制作好的别人的作品，我们都欢迎您授权我们为您制作或者出版，联系信箱是：scdown@vip.sina.com。

登陆<http://www.fbqk.org>即可进入风暴轻狂网站。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您跟“风暴轻狂”站长联系。

网站地址：<http://www.fbqk.org>

郑渊洁随笔

第一次写皮皮鲁

郑渊洁 著



学苑出版社

郑渊洁随笔

- 第一次干缺德事
- 第一次进广播电台播音室
- 第一次杀人
- 第一次滑冰
- 第一次答高考语文试题
- 第一次吃自助早餐
- 第一次在发廊理发
- 第一次打人
- 第一次挨打
- 第一次向保险公司理赔
- 第一次与狼共舞
- 第一次看书
- 第一次挣稿费
- 第一次写歌词
- 第一次存款
- 第一次看儿子发表作品
- 第一次参加评职称
- 第一次接触将军
- 第一次写童话
- 第一次请书法家题写刊名
- 第一次安装电话
- 第一次钓鱼
- 第一次吃人肉
- 第一次买进口钢笔
- 第一次调动工作
- 第一次出生
- 第一次参加抗洪
- 第一次被盗
- 第一次当兵
- 第一次写舒克
- 第一次出工作事故
- 第一次看电视
- 第一次动手术
- 第一次经历世纪末
- 第一次到大学演讲
- 第一次买汽车
- 第一次欺骗组织
- 第一次写皮皮鲁

ISBN 7-5077-1919-7



9 787507 719192 >

定价：16.00 元

责任编辑：张 翔

封面设计：孙移风

郑渊洁随笔

第一次写皮皮鲁

郑渊洁 著



学苑出版社

敬告读者

本书封面贴有郑渊洁授权出版防伪标识。此防伪标识内含隐形皮皮鲁头像,在验钞灯照射下即显现。如无此标识,即为盗版书。请您举报售书地点和售书人,一经查实,本社必有奖励。

举报电话:(010)6828149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渊洁随笔:第一次写皮皮鲁/郑渊洁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9

ISBN 7-5077-1919-7

I. 郑… II. 郑…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4550 号

责任编辑:张 翔

郑渊洁随笔——第一次写皮皮鲁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邮编:100036

电话:(010)68281490、68279295

北京市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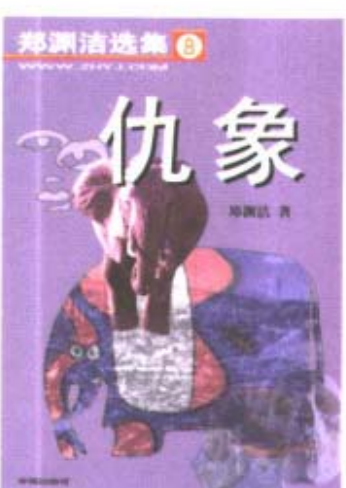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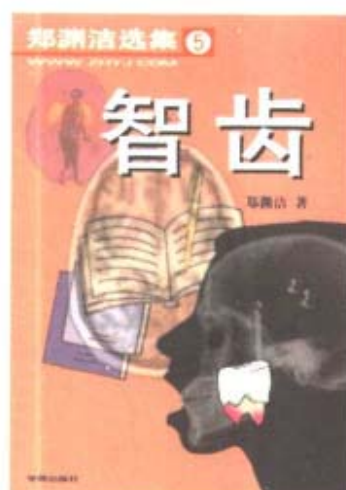
850×1168 32 开本 10 印张 150 千字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册 定价:16.00 元



郑渊洁网址: WWW.ZHYJ.COM



郑渊洁童话作品



目 录

第一次干缺德事·····	(1)
第一次进广播电台播音室·····	(16)
第一次杀人·····	(22)
第一次滑冰·····	(31)
第一次答高考语文试题·····	(34)
第一次吃自助早餐·····	(48)
第一次在发廊理发·····	(54)
第一次打人·····	(57)
第一次挨打·····	(64)
第一次向保险公司理赔·····	(68)
第一次与狼共舞·····	(78)
第一次看书·····	(82)
第一次挣稿费·····	(89)
第一次写歌词·····	(99)
第一次存款·····	(105)
第一次看儿子发表作品·····	(114)
第一次参加评职称·····	(123)
第一次接触将军·····	(133)
第一次写童话·····	(140)
第一次请书法家题写刊名·····	(150)

目录

第一次安装电话	(162)
第一次钓鱼	(175)
第一次吃人肉	(183)
第一次买进口钢笔	(189)
第一次调动工作	(196)
第一次出生	(203)
第一次参加抗洪	(207)
第一次被盗	(215)
第一次当兵	(221)
第一次写舒克	(227)
第一次出工作事故	(231)
第一次看电视	(239)
第一次动手术	(245)
第一次经历世纪末	(255)
第一次到大学演讲	(261)
第一次买汽车	(267)
第一次欺骗组织	(282)
第一次写皮皮鲁	(288)
后记	(294)
郑渊洁作品精彩语言摘录	(296)



第一次干缺德事

人一生其实只干两件事：积德事和缺德事。一生从未做过缺德事的人大概不多，关键是缺德事和积德事的比例。

我第一次干缺德事是在1982年。当时我在北京市一家新创办的少年杂志当编辑。办过期刊的人都知道，最令编辑部上上下下梦劳魂想的事莫过于刊物的发行量了。我们的刊物刚刚在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地球上创刊，印数自然小巧玲珑。编辑部的同人们无不想一口吃个大胖子，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我们的杂志的发行量直逼天文数字。如果真是这样，好处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主编脸上好看不说，每位编辑也能因此获得各种利益。然而谈何容易？

几期出版之后，刊物的发行量徘徊不前。



000

在尚未实行市场经济的年代，我们的头儿极具超前意识地决定成立一个发行组，以推动刊物发行量的上升。头儿物色到编辑部里一位年龄濒临半百的男性编辑，找人家谈话时，没承想被老人家一口回绝。在国家的字典里尚无“下岗”词条的那个铁饭碗时代，碰了一鼻子灰的头儿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干生气没辙。

当时我正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血气方刚年龄，竟然自告奋勇地向领导请战。走投无路的头儿成全了我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与刊物共存亡的敢死队精神，责成我在完成编辑业务的同时，兼任编辑部发行组长。

立下不成功便成仁毒誓的我，在出任发行组长一个月后，才发现事情比我想像的要难得多。当时我们还不懂得增加刊物发行量的真正途径只能是提高稿件的质量，以为设立一个发行组就万事大吉了。刊物通过邮局发行，读者是否订阅完全看读者是否喜欢看你的杂志，谁也不能强迫。我多次去邮局的报刊发行科做人家的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多发行我们的杂志，人家爱莫能助地说他们目前尚未拥有一种能使某期刊的读者群突然扩大的办法。上任一个月后刊物的发行量仍无起色，我感到十分沮丧和没面子。



PIPILO
皮皮魯

第一決平缺德事

一天下班后，编辑部的一位编辑陪我到一家饭馆借酒浇愁。酒过三巡后，我对他说：

“如果《宪法》规定全国的每个孩子必须订阅咱们的刊物就好了。”他说：“渊洁你别灰心，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说孩子最听谁的话？”我说：“家长。”他说：“还有呢？”我想了想，说：“老师。”他说：“如果老师让学生订咱们的杂志，学生敢不订吗？”我说：“不敢。可是天下有这么混蛋的老师吗？”他说：“如果给老师好处，老师怎么不干？”我问：“咱们拿什么给老师好处？”他给我算了一笔账：“杂志通过邮局发行，邮局要留下杂志定价的40%作为发行费用。如果咱们绕过邮局直接通过学校的老师向学生发行，这40%就省下来了。咱们只需将20%作为提成送给老师，老师就高兴疯了。编辑部除了原有的利润，还能干赚定价的20%。”我说：“够缺德的。倒霉的是孩子。”他说：“是缺德。最终倒霉的是家长。孩子又不挣钱。”我说：

“其实应该按定价的 40% 给老师提成，本来这 40% 应该给邮局，现在通过老师发行，老师该拿这 40%。”他说：“只要不超过 40%，给多少都行。”我说：“我一个学校一个学校找老师？还不累死？再说人家不认识我，难度够大



的。”他说：“我再给你出个主意，每个小学都有一名大队辅导员，大队辅导员归团区委学校部领导，他们每个月都去团区委开例会。你先去团市委学校部，争取搞到各团区委学校部部长的名字和他们开例会的时间地点，然后参加各个区的例会，你就可以守株待兔了。”

我茅塞顿开。但伴有强烈的负罪感。我还醒悟到编辑部领导没任命他为发行组长属于工作失误或渎职。

可怜无数家长的钱包在我们酒足饭饱时被注定了在劫难逃的命运。

当天下午，我怀揣介绍信来到团市委学校部，部长叫沙万泉，是一位精干的男士。我递上介绍信，然后说明来意。

我忙更错他的正确理解：“不是通过辅导员搞发行，是通过辅导员让学生了解咱们北京自己的少年刊物。北京的少儿刊物当然首先面



第一决平缺德事

对的是北京的孩子。”

说完我将带来的刊物给他看。沙部长一边翻阅一边问我刊物的一些问题，我看出他对于我们企图通过团市委系统向学校推销刊物保持了一定的警惕性，于是我极力向他游说，就差杜撰说我们的刊物还有一个刊名叫《少先队员必读》了。

最后沙部长总算同意让我参加各团区委的一次大队辅导员例会，但他提了一个条件：只能通过辅导员向学生介绍我们北京又有了一家新的少儿刊物，不能通过辅导员强迫学生订阅。

我揣摩，在 1982 年，沙部长大概还不懂“回扣”这个词，他当时肯定没有想到我们会使用给辅导员提成的方法诱惑他们为我们效劳。

我开始轮流参加各团区委的大队辅导员例会，我记得第一个参加的是崇文区的会，然后风尘仆仆地去海淀区、东城区、西城区、宣武区、朝阳区……

我口干舌燥地告诉大队辅导员们，我们的刊物多好多好，北京的刊物如果北京的孩子不看光让外地的孩子看太亏了。我希望他们通过班主任动员学生订阅我们的刊物。最后我暗示



PIPILO
皮皮魯

第一決平缺德事

在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竟然睡着了，摔得头破血流。我认定这是老天爷在警告我。我担心后边还跟着比摔跤档次高的系列惩罚，于是我坚决不再搞发行了。我们的刊物的印数于是以令人目不暇接的神奇速度叶落归根。

若干年后，我的儿子上了小学。他的老师强迫他买的没用的东西品种之多数额之大，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小巫见大巫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的儿子从上小学一年级起每学期都必须买一盒名为《音乐欣赏有声教材》的录音带，而老师并不要求学生听。这样的录音带我收集了一堆，全都没有开封。我估计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我孙子上小学时，老师会强迫他买录音机的。届时我将他爸爸上小学时被老师强迫买的未开包的录音带送给他让他使用老师强迫他买的录音机听，他一定会获得凝重的历史感。只可惜录音带不是酒，未必存得越久越香醇。

随着收费频率的增高，连有回扣的老师都收烦了，也许是出于不干扰应试教育的考虑，老师竟然发明出预收一笔费用然后逐步扣除的方法。老师强迫学生买的东西五花八门，从毫无可读性的低劣少儿报刊书籍到一穿就破的校服，从学习用具到手工制作。但我毫无怨言，



第一 次 平 缺 德 事

家长一张名正言顺的用白纸打印的信，我家戏称其为白皮书。儿子中止进餐从书包里将白皮书找给我看。白皮书上说是给学生注射“甲肝疫苗”。儿子从我的脸色上判断我可能会拒绝交费，他说：“我明天必须交钱。不带钱，老师会让我回家拿。”我说：“钱你照交，到打针那天，我给你请病假。这针咱们绝对不能打。谁为了经济目的往我儿子身上注射东西，我就跟谁拼命。”我儿子后来说，他从来没见过我的脸色那么难看过。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生养一个孩子不容易。

次日，我给北京市教育局打电话，向他们询问最近是否在全市小学给学生注射甲肝疫苗，回答是否定的。保险起见，我又给北京市卫生局打了电话，答复依然是否定的。为了杜绝冤假错案，再保险起见，我又给儿子就读的学校所在的区教育局打了电话，答复还是不知道此事。放下电话，我浑身颤抖，我不能不想起日本 731 部队。家长将生龙活虎的孩子送到学校，难道孩子一进校门就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牲口？

当天晚上我向儿子宣布，打针那天你不用去上学了。我将调查结果向他通报。往常每逢我不忍心看儿子受应试教育摧残而弄虚作假给



处境会朝不保夕。儿子说当然得保密。

我不得不佩服记者的嗅觉。我以为事情已经完了，没想到几天后记者朋友来电话说，他继续调查了此事，甲肝疫苗一支才 10 元，学校敢收学生 18 元！他还说卫生防疫站可能是 13 元批给学校，学校每支干赚 5 元！他还说卫生部认可的生产甲肝疫苗的厂家有哪家哪家，其余的都是不合格药品。还说经他了解我儿子学校准备给学生注射的甲肝疫苗的生产厂家名不见经传。他说这样缺德的事如果不曝光后患无穷。我一听急了，说你敢！你爱曝哪所学校都没关系，就是不能曝我儿子的学校。你们新闻部的人都知道是我给你提供的新闻线索，你们去学校拍摄时，你怎么能保证你们的司机不和学校的司机聊天？一骂交警就有共同语言无话不说了。如果让学校知道了是我搞的鬼给学校造成了这么大的经济损失，我儿子往后还怎么在学校混？我威胁他说你如果曝光我就和你断交。他权衡后选择了作罢。

1998年3月18日，山东单县卫生防疫站副站长宋新华自行携带碘钙营养片到单县城关第一完小推销。宋新华是每片9分1厘进的药，他卖给学校每片4角。学校卖给学生每片6角。3月24日至25日，学校将碘钙营养片发给

第一 决于缺德事



说了，不吃药也要交钱。我吃了就肚子疼。”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如果学校将学生当作摇钱树，这还是学校吗？如今，有些学校的学生事实上已经成为学校向家长勒索钱财的人质，有自己的亲骨肉在“绑匪”手中，哪个家长敢不老老实实交钱？如果我的儿子仍在那所小学上学，给我10个胆我也不敢写这篇随笔！一个老师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对哪个学生或他的家长有意见，我治这个学生的最好办法不是体罚他或骂他，而是永远不搭理他！”我当时毛骨悚然。这在本质上属于撕票。

1998年4月，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破获一起特大贪污案。吉林省教委下属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孙瑞星贪污公款200多万元。等待孙瑞星的，恐怕除了子弹不能有别的什么东西了。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在不是创造巨额利润的企业的教委办公室居然能贪污200多万元！

家长之所以任凭学校搜刮钱财，说穿了是怕孩子日后上不了大学。为了孩子能上所谓的好学校或在学校受老师的器重以保证孩子将来跨进大学的门，家长面对学校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什么都可以付出。但当学校要拿孩子的命挣钱时，家长也能付出吗？



将来当老板的家长于孩子在校时就敢对校方的所有不合理行为说不。真有这一天，我们的教育就出现了曙光。

在1995年12月，我可能救了一个学校的全体学生的命。我希望这件积德事能抵销我在1982年干的缺德事。

使我内疚的是，我没能同意电视台在1995年底利用媒体警告学校不要通过给学生打针吃药创收。真要是那样，也许今天就不会有如此多的孩子受服用碘片服用肠虫净片的荼毒了。我又干了一次缺德事。上帝宽恕我。

最后，我给凡是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家长提个醒儿：当您的孩子告诉您学校要收费给学生打针吃药时，不管您昔日在孩子面前精心塑造了多么道貌岸然正人君子的高大形象，您在交费后也必须屈尊协助孩子作案在打针吃药那天逃学。否则孩子一旦遭遇不幸，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您拿什么望子成龙？



第一次进广播电台播音室

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能一味赶路，应该学会欣赏沿途的风光。回忆是一种欣赏人生旅途风光的好办法。

我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听电子管收音机是唯一的媒介娱乐方式。电子管收音机上有個很小的显示窗口，当你打开收音机的开关后，显示窗口里会慢慢出现一个类似舞台大幕那样造型的图案，随着“大幕”的拉开及变绿，收音机就出声了。儿时我经常揣摩收音机为什么会发出人的声音，我甚至一度曾经认定收音机里藏着小人儿。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知道收音机里的声源来自广播电台。

我第一次进入广播电台的播音室是在 1987



年。那年的5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的记者崔永元打电话给我，他说该节目时常收到听众关于要求采访我的来信，希望我能去广播电台录制一个节目，以满足听众的要求。我答应了。

5月23日上午，我按约定的时间来到位于北京复兴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门口，崔永元已经在门口等我。崔永元带我到传达室办理进入广播电台的手续。随后，我跟着崔永元走进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头一次进入广播电台，我很是好奇，不禁想起儿时认为收音机里藏有小人儿的怪念头。

走进《午间半小时》节目组的办公室，崔永元将我介绍给一位叫虹云的女士，崔永元告诉我，一会儿由虹云同我录制节目。在办公室稍坐后，虹云对崔永元和我说：“咱们去播音室吧。”我跟在他们后边走进一个有军人把守的房间，房间的墙壁由布满小孔的隔音材料制成，房间中央是密密麻麻的播音设备。虹云大概是看出我有点儿紧张，她问我：“郑渊洁，你是头一次进播音室吗？”我说是的。虹云又问：“紧张吗？”我说很紧张。虹云说她头一次进播音室也紧张，还说没关系，慢慢就适应了。

第一次进广播电台播音室



第一次进广播电台播音室

长被惊动后对那孩子说，如果你能把郑渊洁请到咱们学校来给全校同学做一次报告，我就特批你可以不写家庭作业。那校长对于郑渊洁近年深居简出埋头写作一般不参加社会活动早有耳闻，他听说连郑渊洁亲儿子就读的学校都请不动他，那校长由此断定该同学根本不可能请到郑渊洁，于是敢于夸下特批学生不写作业的海口。崔永元希望我能助那孩子一臂之力，去该学校一次，将那孩子从家庭作业的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

看在崔永元将小便时不能说话的养生秘诀免费传授给我的情意上，我答应了。

1991年10月15日下午，我驾驶汽车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面的国家海洋局门口接上崔永元，一同去位于万寿路的××小学。我当时的感觉是我们像两位仗义行侠的骑士去扶助弱小杀富济贫。

当将信将疑的校长真的看见我们时，他立即吩咐老师集合全校师生去大礼堂。

我想我此生此世是忘不了那敢于罢写作业的男孩子在校门口见到我时的激动表情了。

我在大礼堂给该校的学生讲话，我告诉他们我上小学时考试成绩并不好，我还告诉他们有一位老师曾断言我长大不会有出息，我又告



主持人，他有地道的幽默感。我这样褒奖他，绝不是因为他向我传授过养生秘诀，有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向我传授的秘诀比小便不说话级别高多了。

第一次进广播电台播音室



第一次杀人

温馨手术环境中铲除孩子。

我对 N 君说，孩子既然已经组合成功，他就有生存的权利。你应该立即同她结婚，要这个孩子。N 君说，他们全然没有结婚的打算。

既然如此，我只有帮朋友度难关一条路可走了。

我服兵役时的一位战友的太太在北京北医三院工作，我称其为嫂夫人。我找到嫂夫人，说明来意。没想到嫂夫人对我说，是你自己干的坏事吧？我一愣，说，我没那么笨。再说了，真要是我的事，我最低也得要求嫂夫人请院长亲自给她做手术。我让嫂夫人往窗户外边看，从右边数第7棵树下那个心神不安鬼鬼祟祟的小伙子就是罪魁祸首，他在外头一边给我放风一边等信儿。嫂夫人当即表示全力鼎助，由她安排一切未尽事宜。

我出去告诉院子里的 N 君，一切办妥。我还说你让我背了黑锅。N 君说要不怎么叫朋友呢。我说别的黑锅我可以背，这种黑锅我不愿意背。把人家肚子弄变形了是笨蛋才干的事，典型的弱智。N 君推脱责任，声称他也是受害者，他从小没受过性教育，还是早年当兵在部队农场劳动时看见狗交配才受启发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自学成才的。而狗是不可能采取任何避



她可能成为影响人类进程的科学家，也可能是出类拔萃的国家领导人，还可能是闻名遐尔的大作家，更可能是超群绝伦的作曲家，因为他或她的外公是中国一位大名鼎鼎的作曲家，其谱写的某首歌曲在 70 年代中叶的中国大陆扣除聋人外未听过者绝对超不过 5000 人。我看过一本名叫《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 50 个人》的书。如果这个孩子出生后能成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人，而我们今天杀了他或她，人类历史进程将因此改变……

我不敢再往下想了。

手术室里隐约传出杀猪般的嚎叫声。我毛骨悚然，不能不想起白公馆渣滓洞中的酷刑。N 君脸上也呈现出过了就忘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负疚神色。

在我上学的年代，课程中没有性教育。我们这一代人的性知识全部来自于同龄人的口头黄色笑话，因此我们从小就认定性和流氓行为是划等号的。我记得我在上小学 5 年级时一次和同伴到北京邮电学院玩，我们无意中发现一对男女在闲置的游泳池更衣室里拥抱接吻，我们留下一个人监视坏人，其余的人跑出去向路上的大人报案说游泳池更衣室里有坏人要流氓。当我在 18 岁服兵役时因病住院从同病房的



PIPILU
皮皮屋

第一決素人

孩子负责的合格父母，应该在孩子 15 岁之前告诉孩子避孕常识，这不是怂恿孩子越雷池一步，而是防患于未然，不使孩子特别是女孩子蒙受杀猪般的痛苦。据说美国的父母就是这么做的。我们的父母有时过于天真，他们以为不向孩子进行性教育就可以将孩子蒙在鼓里，其实，蒙在鼓里的恰恰是父母。我不想在这里引用我看到的一份关于我们的中学生有什么什么经历的权威调查的数据，我只说在我的住处附近的一个免费公园里在我散步时司空见惯的中学生旁若无人的至亲至爱场面就完全应该能引起家长的如梦初醒了，每每彼时，我都会想，这些可爱的孩子的父母一定以为他们的情窦未开不谙人事的孩子此时正在学校埋头自习呢。顺便说一句，比邻公园的是一所重点中学，都是清一色的好学生。在您的孩子营养过剩发育超前又有肆无忌惮的影视画面抛砖引玉的今天，守身如玉坐怀不乱恐怕只能是家长的一厢情愿了，何况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躲得了中学躲不过大学，躲得过大学躲不过结婚，婚后生活的幸福依然需要避孕的保驾护航。作为父母，晚教不如早教。

避孕应该和计划生育一样，享受基本国策待遇。导致女友或配偶去医院杀猪的男性说轻



能否否认的。占我国人口比例极低的有文化和经济条件好的城市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占人口绝大多数相对文化程度低和经济条件差的农村家庭事实上却可以随意生，我们民族的人口素质何以提高？传销在国外早已被证明是一种成功的营销方式，怎么到了咱中国就成了坑蒙拐骗的同义词甚至演变为江湖帮会不得不让政府发红头文件予以取缔？依我看这和咱们的人口素质不无关系。试想倘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事实上的双轨制导致农村人口在我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只怕取缔保险公司也是迟早的事，君不见保险公司业务员侵吞投保人保金后毁弃保险单的恶行屡被媒体披露？我觉得我们的计生委还有很多事要做，任重道远。

最近北京开始定期公布城市空气质量，市民们才得知自己居住在这个世界上拥有最脏空气之一的城市里。据说发达国家发给其派驻到北京的使馆工作人员一笔可观的“呼吸污染空气费”，否则人家可能不应聘或主动下岗。空气对孩子的成长可能是比教育和营养更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没有好的身体，素质再好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否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早年不会得以流行。试想高素质的人拖着被满含悬浮颗粒的空气戕害得



第一次滑冰

第一波杀人

我小时候看过表姐滑冰，很是羡慕。也曾位于北京南横街的姥姥家穿上表姐的冰鞋在陆地上练习行走，但终究无缘真刀真枪地到冰上滑行。北方的孩子不会滑冰，不能不说是一件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憾事。

1975年12月，正在南昌服兵役的我去太原探望父母时患病住进了解放军276医院内二科。届时我20岁。276医院位于太原晋祠，背靠悬瓮山，医院门口正对一座碧湖，风景极佳。12月18日上午，医生查房后，新来了一位年轻的军人病号住在我旁边的病床上，我问他得的什么病，他说肠炎。我又问他在哪儿当兵，他说在省军区宣传队跳舞。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阎维文。他问我叫什么名字，



发音怎么样。他还说他铁了心要唱歌。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数日后，年轻得连见好就收都不懂的我们终于在深夜滑冰时被护士双双擒获。再弱智的护士也会觉得天天晚上戴着帽子睡觉的病号应该转到精神病科。我的第一次滑冰经历以悲剧告终。

与阎维文在 276 医院一别就是 18 年。我们第二次见面碰巧也是 12 月 18 日上午，只是时间老人无情地将日历由 1975 年翻到了 1993 年。那天上午我到北京贵宾楼饭店参加一个会，我惊讶地在环桌而坐的与会者中发现了阎维文。18 年前在太原 276 医院门口的冰湖上分手，18 年后在北京贵宾楼饭店重逢，我和阎维文追昔抚今感慨万千。我告诉阎维文，每当他在电视机里唱《说句心里话》时，我就对我儿子说，这人我认识。我儿子说我吹牛。阎维文告诉我，他对他女儿说，爸爸认识你看的这本写皮皮鲁的书的作者，他女儿亦死活不信。看来我们都属于墙内开花墙外香。



郑亚旗兴致勃勃地站起来说：“咱们去书房，那儿有氛围。”

郑渊洁和郑亚旗易地继续高考。作为监考老师的郑亚旗说了一句丧失原则的话：“郑渊洁，你可以开卷考试，可以查字典查资料。”

自尊心和法制观念驱使郑渊洁坚决拒绝了高考舞弊行为。

经过 40 分钟的苦苦鏖战，郑渊洁终于过关斩将杀入第 4 小题。

整张考卷一共有 35 道小题。

郑渊洁一看第 4 小题松了一口气，他认为这是自己的拿手好戏。该题如下：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中横线处的关联词语，供选择的有 A、B、C、D 四组词语。文字是这样的：“小说家应尽可能把人物对话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不能完全像实际说话。~~讲故事或作报告，~~又决不能像日常说话那样支离破碎，~~不写稿子，~~应像一篇文章。”下面供考生选择的四组词语各有 5 个词汇，依次是：A. 虽然而却即使也；B. 尽管可是而虽然但；C. 尽管而却虽然但；C. 虽然相反可即使也。

本以为能在此关速战速决的郑渊洁被绕晕了，他如堕五里雾中，找不着东西南北，满眼



饭。

郑亚旗神情专注地披阅郑渊洁的高考语文试卷，郑渊洁在一旁像是等待法官宣判的被告。

“43分。”郑亚旗向郑渊洁通报其高考语文试卷得分。

“不可能！”郑渊洁绝对不能接受这个分数值。他清楚该考卷的满分是150分。

“我判得还比较宽松，不信你复核。”郑亚旗说。

郑渊洁将评分标准和他的考卷一一对照，他不得不承认郑亚旗在披阅他的考卷时有明显的孝顺成分。

看到从硬指标的选择题中无法挤出分来，郑渊洁只有打比较有弹性的作文题的主意。他说：“作文题一共60分，我怎么可能两篇作文一共才得10分？”

郑亚旗说：“作文采用分项分等评分标准，你的两篇作文同属四等，各得5分。”

郑渊洁拿过报纸细看作文分项分等评分标准，第四等的标准是：思想认识较差，胡编乱造。

“我的作文怎么能是思想认识差？还胡编乱造？”郑渊洁不服气。



第一波 答 高 考 语 文 试 题

凭的妈妈爸爸找工作比较困难，他们只好倾其所有做了个摊煎饼的小推车，靠卖煎饼度日。

小乐进家后发现家中没人，屋子里十分凌乱。这时，邻居王奶奶过来一边擦眼泪一边告诉小乐，妈妈得了急病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去了。小乐赶到医院，看见爸爸趴在一张蒙着白单子的床上哭，小乐冲上去，妈妈已经停止了呼吸。小乐摇着妈妈的尸体嚎啕大哭。事后，小乐从爸爸口中得知，那天上午，正在街头卖煎饼的爸爸遇上了市容执法队，执法队以无照经营为由没收了煎饼车。爸爸回家后告诉了妈妈，刚给小乐洗完一只鞋的妈妈当即突发脑疝昏死过去。煎饼车是全家的命根子。

家里没钱给妈妈买骨灰盒，在征得爸爸的同意后，小乐将妈妈的骨灰放进妈妈生前最后一次给他洗的那只鞋里保存起来。在骨灰鞋前，小乐发誓长大混出个人样来，为好多好多人创造就业机会，为国家排忧解难。

一周后，臂戴黑纱眼睛红肿的小乐穿着一双干干净净的鞋上学去了。



和那只妈妈没洗的鞋较劲。就算他当时洗了，也干不了，他要么还穿上上午的鞋去上学，要么另找一双干净的鞋换上。”

郑亚旗为出高考题的专家辩解：“可能小乐的老师要求那天下午全班同学必须穿干干净净的鞋，比如去烈士陵园扫墓什么的。”

郑渊洁问：“干干净净的鞋是什么标准？必须是刚刚洗过的？”

郑亚旗语塞：“……干干净净就是特别干净一尘不染……”

郑渊洁说：“老师要求全班同学中午回家换干干净净的鞋？上午穿过的都算脏鞋，不能穿着脏鞋去烈士陵园亵渎先烈？”

郑亚旗：“……”

郑渊洁：“再说了，小乐回家时脚上穿着一双鞋，妈妈给他洗的那只鞋和没洗的那只鞋加在一起又是一双鞋，如果下午小乐再换一双鞋，小乐就有至少3双鞋了。现在的学生上学一般都穿球鞋，在脚的体积日新月异的少年时期，家长会给孩子同时备3双球鞋？”

郑亚旗：“……小乐可能是晚上放学回家看见妈妈只给他洗了一只鞋……”

郑渊洁：“反正这题出得有点儿不合逻辑。只有我那么写，还勉强说得通。”

[illegible]

郑亚旗说：“参加出高考题的，肯定都是专家，我看还是你的想象力不够丰富。不管怎么说，你的这篇作文到了评卷老师那儿，最多得5分。”

郑渊洁不再争辩，其实他心里清楚，自己的这篇作文在高考判卷老师那儿能拿 5 分就不错了。

答高考语文试题只得了 43 分，郑渊洁无地自容。此后，有整整 11 天时间郑渊洁因丧失了写作的自信导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眼看《童话大王》月刊交稿的日期一天天逼近，郑亚旗吓坏了，认定自己闯了祸，他感慨地说：“如果作家协会要求所有作家像足球运动员必须通过体能测试那样答高考语文试题，考试结束后，作家协会就可以宣告解散了。”

7月22日，郑亚旗从当天的《北京晚报》第4版上看到一则信息，他认为该信息对恢复郑渊洁的写作功能有帮助，郑亚旗如获至宝地手捧报纸走进郑渊洁的房间，对面壁发呆的郑渊洁说：“我必须承认我给你的作文题打分打低了，其实很多考生都在胡编乱造。这张报纸上说，有20%的考生在写今年高考语文试题中的另一篇作文《战胜脆弱》时，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的健在的父母强行送进坟墓，他们大都不



皮皮糕

第一次答高考语文试题

约而同地这样写：我的父母不幸在我高考前双双身亡，但我战胜了脆弱，今天微笑着走进考场！担任高考阅卷的安徽淮南一中杨老师告诉记者说，当他看到第一个考生这样写时，他很是同情该考生的境遇，也很感动。但很快他发现自己被愚弄了，怎么会有如此多的考生的父母在今年高考前夕不谋而合地撇下苦读了12年书已经看见大学曙光的孩子撒手人寰？！更有一位丢卒保车保全了父母性命的安徽考生在《战胜脆弱》中大写自己在失去双手后如何战胜脆弱学会了用脚写字，以至于今天用脚参加高考。而事后安徽省高招办表示，今年全皖绝对没有用脚答卷的考生。”

郑渊洁笑得喘不过气来。

郑亚旗相信这条信息能治愈郑渊洁的自卑，他乘胜进军，说：“今年高考的作文题，第一篇补写《妈妈只洗了一只鞋》必须使用虚构的手法补写。而第二篇《战胜脆弱》是不容许虚构的，该题要求考生‘根据自己的情况，举出实例，写一篇关于你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的文章。不可写成小说等文学体裁。’面对如此多的考生在不可以虚构的作文《战胜脆弱》中活埋自己的父母，一位多年参加高考阅卷的资深大学教师说，这是应试教育语文写作训练



然大学毕业 10 年后的人再回过头参加初中毕业考试都难以及格，我这个小学毕业 30 年后的人参加高考单项居然能得 40 多分，实在是奇迹。于是，郑渊洁如有神助般恢复了自信，坐到电脑前，劈里啪啦敲键盘文思如泉涌，止都止不住。

日后郑亚旗作为笑料偶然又提及此事时，郑渊洁只说了一句话：“毕竟我还得了43分，差可告慰。”

第一次答高考语文试题



PiPiLu
皮皮露

第一次吃自助餐

大约是 1989 年的一天，我在家接到台湾《小鹰日报》主编蔡先生的电话。《小鹰日报》日前开始连载我的作品。这次主编趁来北京的机会，要会会作者，增进感情，期望双方进一步合作。住在台湾饭店的蔡先生约我次日到台湾饭店对面的一家五星级饭店一边共进早餐一边谈买卖著作权事宜。

次日早晨，当我和蔡先生走进那家饭店的餐厅时，我看到与寻常餐厅不一样的场面：不同的食物放在不同的器皿里，依次开架摆放在长桌上任人自取。

这是我第一次见自助餐。

见我略显踌躇，蔡先生对我说：“这是自助餐，请郑先生随意。”

我不知道怎么随意，特怕给大陆作家丢人，只有看蔡先生随意后我再模仿。

大概是出于礼节，蔡先生执意要我先“随意”，而我坚持要他先“随意”。只见蔡先生从一摞盘子的最上端拿了一个盘子，然后走到一个个开放的食物盆前从中取物。我模仿蔡先生的动作，也拿了一个盘子，跟在他后边照葫芦画瓢，他拿什么我拿什么，生怕一步棋走错导致满盘皆输出洋相。

蔡先生将手中的盘子装满后放到临窗的一



张餐桌上，我跟着他也放。他对我说：“再去拿点儿水果。”

蔡先生说完折返回去再取盘子再拿食物。这时的我认为自己已经自助餐毕业了，应该单独行动了。我取了一个空盘子后，离开蔡先生，开始随意。我看见几个盆里盛放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食品，像点心，有的是巧克力色，有的是金黄色。一贯勇于尝试新生事物的我对这种食物产生了兴趣和食欲，我从几个不同的盆里分别取了满满一盘这些我没见过的食品端回餐桌。

我和蔡先生面对面坐下，我们一边用餐一边谈版权交易。我开始吃那一盘“点心”。那食物进了嘴我才感觉不对头，干燥如麻，味同嚼蜡。我控制住自己没将它们吐出来，我猜想这可能是国外的高级食品，我曾经在报纸上看过美国越是有钱人越吃黑面包的文章。我说服自己将那食物咽进肚里，我看了蔡先生一眼，见他没什么反应，我又吃了第二口。后来我才知道，我吃的那东西叫麦片和玉米片，是国外流行的一种早餐食品，正确的食用方法是泡牛奶或果汁吃，不能干吃。现在回想起来，我惊讶当时我从哪儿获得的毅力将那一整盘麦片干咽了下去。我同时想不明白蔡先生为什么不制



第一次吃自助餐

止我干吃麦片。后来我读到这样一则故事，我才晓得蔡先生可能是一位绅士。

那故事大意如下：一位享誉全球的著名球星应邀到英国上流社会赴宴，席间，侍从给每人端上一盆洗手水。球星以为是喝的水，于是一饮而尽。同桌的英国贵族们为了表示对球星的尊重和礼貌，都争先恐后痛饮洗手水。试想倘若贵族们在球星喝洗手水时向他指出这水不是喝的，场面肯定尴尬。

由此想来，那位蔡先生一准是出于礼貌才未制止我干吃麦片。细琢磨也因为不是很熟的朋友，所以才有如此礼节。不过我想当时蔡先生可能因大陆作家干吃麦片这个细节作出大陆作家比他预想的还要贫困从而使他再度降低付给大陆作家的版税。回忆那次我们商定的版税标准，实在不算高。假设当时我将牛奶浇在了麦片上，保守估计，我得到的版税起码多1个百分点。那时，台湾出版商买大陆作家的著作权开价普遍低，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柿子捡软的捏。后来我再同台湾出版商谈版权交易时，条件是我的版税率必须高于台湾作家的版税率，否则免谈。奇怪的是我竟屡战屡胜。我认定这是由于我当着他们将大杯大杯的牛奶倒在大碗大碗的麦片上的缘故。

由蔡先生我又想起另一位台灣朋友。那是趙



座大门。我告诉赵先生，这是北京的使馆区。我边开车边当导游，告诉他这是美国大使馆，这是英国大使馆，这是日本大使馆，还有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末了我极阿 Q 地对赵先生说，怎么样，不虚此行吧？台湾有美国英国法国大使馆？绝对没有！

事后我有点儿于心不忍，动了恻隐之心，觉得自己作为地主显得太小家子气，于是在远离使馆区的一家饭店请赵先生吃了一顿，算是给他压惊。

第一次吃自助餐



第一次在发廊理发

我理发都去理发馆，不管是发廊在大陆问世之前还是问世之后。发廊在大陆出现应该是1980年之后的事，不知为什么，我很少问津。我第一次进发廊理发是在广州。时间是1987年6月13日下午。

由于两天后要去香港访问，我直觉地认为在香港理发肯定比大陆贵，所以决定临行前将毛发留在故乡，免得在香港挨宰。

我寻觅了两条街，竟然一水儿的全是发廊，没有一家理发馆。万般无奈下，我硬着头皮走进一家相比之下规模最小的发廊。

我判断这家小发廊是夫妻店，有着明显亲昵关系的一男一女热情招呼我，当时发廊里没有顾客。女士给我理完发，示意我到水池边洗



头。我走到水池边一愣，水池边供我坐的不是北京理发馆洗头坐的那种木凳，而是一把躺椅。由于我打小在理发馆洗头就是面对水池，在略微踌躇后，我毅然面朝下趴在躺椅上。当我的肚皮接触到躺椅时，我才知道错了，因为我的不是体操运动员的僵硬身体不可能允许我随躺椅的弧度做出反弓姿势，我试图站起来，竟然失败了。

正确的姿势应该是躺在躺椅上仰面朝天洗头。

那对夫妻笑得前仰后合，且无论如何止不住。那女的一边笑一边扶我起来，我也笑。

理完发，他们死活不收我钱。女的边笑边说：我们两口子起码有10年没这么开心过了。

后来我基本上没再进过发廊。1989年我改平头发型后，理发就更不能进发廊了，因为大多数发廊的小姐理不了高难度的平头。发坛的行家都知道，推平头才是真功夫。我每理一次发花3元人民币。有时我坐在理发椅上边理发边对着镜子想，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儿委屈皮皮鲁们的摇篮？

2000年8月的一天，我去理发馆理发。邻座的一位顾客和理发师聊天，他问理发师一个月能挣多少钱。理发师说：“我们这些整天摸



第一次打人

1959年，4岁的我在石家庄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幼儿园上小班。一天在幼儿园吃午餐时，班上的一位男性小朋友不小心摔碎了一个碗。我们的老师勃然大怒，她命令我们停止进食，全体列队站在长方形餐桌旁。

老师像老鹰捉小鸡那样拽着摔碗的小朋友
的脖领子将他拎起来，同时对他怒斥道：“这
是你第二次摔碗了！我再不教训你，你该上房
揭瓦了！”

只见老师一手拎着那小朋友，一手拽过一把椅子。老师坐在椅子上，将那小朋友面朝下俯伏在她的双膝上，再将小朋友的裤子褪至膝盖下，露出孤单无助的屁股。

“你们排队过来，每人打他一下，要使劲”



儿！”老师冲我们喊道。

我们列队依次走到老师面前，轮流打那小朋友的臀部。

“太轻！你给他挠痒痒呀？”老师训斥第一个动手的小朋友。

随着手与屁股接触时发出的声音的分贝量的增加，挨打的小朋友开始哭泣。

轮到我打时，我看见那小朋友的臀部已然通红。平生从未打过人的我一边恐惧地看着老师一边抬起了手。

“郑渊洁！你是打他的屁股还是摸他的屁股？！你没吃饭？再打一次！使劲儿！”老师瞪着我喊。

我第一次打人没有通过老师的考核。

我不得不第二次举起了手，猛击那小朋友的屁股。

我对于自己4岁之前的经历能记起的很少，唯有这件事刻骨铭心地烙印在我的大脑皮层上，且随着岁月的流逝非但不能挥之而去反而日渐凸显。

记得自从那次打人经历后，我就对幼儿园充满了恐惧，想方设法逃避去幼儿园。在有些幼儿园里，老师是至高无上的君王，她们对每一个小朋友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确实有



第一次打人

老师将小朋友关在小黑屋里窒息而死)。后来当我的儿子上幼儿园时，当我得知他因为说话而被老师关了一次小黑屋后，我毫不犹豫地给他办了退园手续。我不能容忍让一个上寻 50 代祖宗都找不到半丝帝王血统的人骑在我的儿子头上作威作福过君王瘾。

我们今天的孩子虽然比他们的任何一级前辈都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但他们在幼儿园在学校在家里精神上往往受到压抑，有多少父母老师在和孩子接触时能将孩子作为一个对等的人来尊重？时至今日，我还时常在媒介上读到诸如老师命令全班学生打某一位学生致残或者父母因望子成龙心切毒打孩子致死一类的暴行。幸而我们现在有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孩子们的权益，但距离我们的每一位孩子都能娴熟地运用这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有一次，一位记者采访我时问我最自豪的事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我最自豪的事是我从未打过自己的孩子。其实别说打，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向世人宣布，在我和我的孩子相处的十多年中，我从来没有使用超过 35 分贝的音量同他说话。

世界上最丑恶的武力行为就是大人打孩



PIPILO
皮皮鳥

第一次打人

文章批驳你们，我想了个办法，咱们打架去！如果你们打赢了，今后你们可以随便写文章侮辱我，我绝不找你们的麻烦。如果你们打败了，你们今后再敢写侮辱我的文章，我就揍扁了你们！”

同为年轻人的张春桥和马吉蜂接受了萧军的挑战，双方约定了打架的时间和地点。地点定在上海法租界拉都路南端的一片已经收割了的菜地上。

在约定的时间，双方都准时到达。马吉蜂的见证人是张春桥。萧军的见证人是萧红和聂绀弩。

萧军早年习武，怀揣沈阳陆军讲武堂的“本科”毕业文凭。可怜那手无缚鸡之力只会舞文弄墨的马吉蜂被萧军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张春桥吓得面如土色。“如果你们再写文章侮辱我，我就打你们！”萧军拍拍手，扬长而去。

从那以后，两位评论家再不敢写文章侮辱萧军了。

我钦佩萧军。我觉得对于一些像张春桥这样的不可理喻的评论家的挑衅，最好的办法就是揍他一顿，而不是写文章反驳。

每每看到今天的作家和评论家在媒介上写



PIPILU
皮皮魯

文章写到这儿，电话铃响了。是一位作家朋友自外地打来的。他说他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突然遭到几位小白脸新潮评论家的发难，气得他七窍生烟。我建议他与其写文章反驳，不如和他们约时间约地点来得痛快。放下电话我有点儿后怕，担心如果出了人命案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家人见我吃不下饭安慰我说，他们绝不会对打，否则今天的文坛不会这般疲软。

第一波打人



第一次挨打

我第一次挨打的起点比较高，被打得头破血流，非缝针不足以封闭伤口。

1960年，我在石家庄上幼儿园中班。不知道从哪一天起，在幼儿园吃饭限量了。人就是这样，不限量时也许吃一个馒头就饱了，限量后吃一个馒头绝对还饿。长大后我才知道那个时期叫“三年自然灾害”，三中全会后才知道那时全国饿死了很多人。当时在幼儿园吃不饱的感觉很难受。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午睡时，有两位女老师背对着我坐在我的床栏杆上，其中一位从兜里像掏金银财宝那样掏出一个生白薯，她狼吞虎咽地咬了一口后递给另一位老师。那老师也不甘示弱地大咬一口后还给同事，两位老师就这么你一口我一口地海吃，馋



PIPILO
皮皮魯

第一次挨打

得佯睡的我垂涎欲滴。时至今日，我还将生吃白薯当作一种美味佳肴，可见儿时留下的印象确实能伴随人终身。

一天，老师让我们在院子里玩耍，不知哪位小朋友先发现院子里的一根铁丝上挂着一个拳头大的向日葵。饥饿的我们如获至宝，我们开始捡石头从两个方向砍那向日葵，试图将它从铁丝上击落为我们果腹充饥。

站在我对面的一位女性小朋友扔过来一块砖头，那砖头与向日葵擦肩而过后击中了我的右前额，我顿时血流如注。闻讯赶来的老师惊惶失措地将我送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生将我放到床上，一张纱布盖在了我的脸上。打麻药，缝针。大概是实习医生的手艺，我的右前额至今留有清晰的疤痕，疤痕下边还有凸出的骨骼，我一直怀疑医生将那砖头也缝了进去。

如今我父亲告诉我，在我的额头上留下疤痕的那女孩子现在可能在南京，因为她的父亲当年从石家庄调到南京工作。掐指算来，她的孩子也该到了读我的童话的年龄。如果她的孩子得知郑渊洁额头上的疤痕是他妈妈的战绩，不知作何感想？



前年我在北京一家餐厅用餐完毕出来时被一位算命先生拉住，他百般纠缠非要给我看面相算命。我说如果你看准了我可以付款，看不准分文不给。他说你右额头上破了相，今生只能为官，不能干别的。我问他我能当作家吗，他连连摇头说绝对不行，还说右前额是分管文运的，破了右前额的人不可能当作家。我告诉他我就是作家。他一愣，忙改口说，那准是大作家。还说右前额破了相的人一般不会成为作家，但一旦成为作家就是大作家。当时连围观的人都哄他。

有时我也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只上过小学的我源源不断写出这许多作品来？会不会是5岁那次前额开花使我耳聪目明开了窍获得了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除这次挨打外，我至今几乎没有挨过打。我最庆幸的是，我从未挨过父母打。经常听一些朋友说他们小时候挨父母打的痛苦经历。父母打孩子是无能的表现，当你抬起手打你的孩子时，等于你向孩子宣布自己没有教育孩子的能力，只有依靠武力解决问题，是典型的认输。

不管怎么说，我的几乎唯一的一次挨打经



PIPILO
皮皮羅

第一次挨打

历在我的脸上留下了永恒的标记。同“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上千万人相比，我的这点儿损失实在算不上什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PILU
皮皮魯

第一次向保險公司理賠

码是多少多少，请您同我联系。

我儿子见我发呆，说：“这人真傻，如果他给郑渊洁留张纸条，郑渊洁不但不会要他出钱修车，肯定还会感动得一塌糊涂然后和他交朋友。”

真是知父莫如子。

正当我感叹国人素质差时，有目击者告诉我，是一个外国人驾车撞了我的车。由此我又生一番感慨，甚至极其不公地断定外国人是入乡随俗。直到后来我从媒介上获悉乔丹的父亲在美国的公路上驾驶儿子耗巨资孝敬他的车跑累了后将车停在路边小憩时，竟然被没生过任何儿子就想不劳而获拥有这辆车的美利坚同胞枪杀，我才在心里为国人素质低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

言归正传，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向停车场索赔，我的理由是我交了停车费，如果车出了问题，停车场理应赔偿。看车人的答复令我吃惊。他说：“我们收的是占地费，不是保管费。您的车就是丢了，我们也没任何责任。”

这时，旁边一辆车的司机提醒我说：“哥们儿，如果你的车上了保险，应该向保险公司索赔。”

我如梦初醒如释重负，庆幸自己洞察一切

[illegible]

防患于未然有先见之明极具现代意识地给自己的汽车买了保险。好在车门被撞坏了并不影响发动机的正常运转，我驾车回家找出保险单，按照保险单上的地址驱车在北京的胡同里好不容易找到了那家保险公司。门房告诉我，今天是星期日，休息。

次日一早，我即驾车赶赴那保险公司。由于是周一，再加上该保险公司门口秀气含蓄的道路状况，我遭遇了严重的堵车。我8点钟离开家，6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两个多小时。快11点时，我终于走进了保险公司的办公室。

一个戴眼镜的男士接待我。我向他说明情况并提出索赔要求。他向我要保险单。我递给他。

仔细看完保险单后，他说：“去看看车。”他说完打开办公柜拿出一架照相机。

我同他来到楼下的汽车旁，他查看了车的伤情，又让我打开发动机舱盖，核对投保单上的发动机号码和这辆车的发动机号码是否同步。确认一切无出入排除了骗赔的可能性后，他开始给我的汽车照相。这是我头一次同保险公司打交道，当时我觉得人家的工作真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

拍完照，我尾随他回到楼上的办公室，等



PIPILU
皮皮魯

第一決向保險公司理賠

他给我赔款或帮我修车。

他收好照相机，对我说：“你得让那家商城的停车场给你开一个证明，证明你的车是在该停车场被损坏的，时间地点经过都要写清楚。”

时间已是中午，不喜欢在外边吃饭的我驱车回家进午餐。胡乱吃了几口饭后，我就趁中午车少赶往那座距离我家少说 18 公里的商城。

停车场的当值人员听了我的要求后，说：“您得找昨天值班的人，他今天休息。他明天下午有班。”

我说：“我离得很远，就是一张证明，我已经写好了，你们盖个章就行。”

他说：“肯定得他来了才能盖这个章。”

次日下午，我再次来到那商城的停车场，谢天谢地那位看车人的老婆孩子当然包括他自己没生病。我向他提出开证明盖章的要求。他说：“章得到商城保卫处去盖，不过我估计人家不一定给你盖这个章。”

我问：“为什么？”

他说：“我陪你去一趟吧。”

我很感激。到了商城保卫处，我将情况向一个小伙子说明，他坐在办公桌后边对站着的我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能给您出这个证



明。”

我问为什么？我还说又不让你们出一分钱，就是盖一个章。

他政策性极强地说：“如果我们给您出了这个证明，您要是拿着它作为证据到法院告我们向我们索赔呢？”

我说：“你们只收占地费，车出了问题，你们没有责任赔偿。”

他说：“话是这么说，但没有法律依据，真要是告到了法院，理不一定在我们这边。如果再碰上一个有影响的名人，通过记者一煽乎，我们怎么不可能败诉？”

我无言以对。

但是他的关于记者的话提醒了我。我的记者朋友很多。我倒不是想打官司，我觉得我认识的记者中肯定有认识这家商城负责人的，可以通过他们找商城负责人达到给我出证明的目的。我回家翻通讯录，极功利地找在报社商业口当记者的朋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找到了。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和那家商城的老总特熟，刚给他们吹过一篇。他说别说让他出个汽车损坏的证明，凭他和他的关系，就是让他出美国是中国的—个省的证明他也得出。他和我约定次



PIPILO
小皮皮屋

第一次向保險公司理賠

日下午2点在商城门口不见不散。

次日在约定的时间，记者朋友带我走进商城总经理的办公室。记者的面子的确大，老总二话没说就给我出了证明。办完事后，记者朋友对我说：“上午我去我女儿的学校开家长会，我女儿的班主任听说我认识你，想请你去他们班和学生见见面。”

历来不爱参加这种活动的我现在是别无选择，只能同意。

当天下午，我拿着商城的证明第三次去了
保險公司。

眼镜看了我递给他的证明，点点头，将我的保险单和证明一同交给一个胖女人。我由此判断胖女人是眼镜的主管领导，她在做类似于出版社审稿件的二审工作。

胖女人对眼镜说：“商城出的证明不行。涉及汽车定赔，必须经交通管理部门也就是交通大队出证明才行。”

眼镜将胖女人的话向我转述。我说那你为什么还要求我到商城开证明？他说他来的时间不长，还没处理过汽车险理赔。

第二天上午，我费尽周折才找到管辖那家商城地域的交通队。事故科的交通警听了我的叙述和要求后，说：“出了交通事故，双方必



人皮肉

第一次向保險公司理賠

通队，一路畅通无阻地开出了证明。中午，他拉我到一美食城叙旧，一顿饭吃了4个小时他还有好多话没说完。

当我怀揣交通队的证明赶到保险公司时，人家已经下班了。

又次日，又经过一番堵车后，我终于将交通队的证明交到了保险公司的眼镜手中。眼镜将证明拿给胖女人看。

胖女人问我：“是你的车撞了人家还是人家的车撞了你的车？”

我说：“是人家的车撞了我的车。”

胖女人说：“我们的理赔规矩是，你的车撞坏了人家的车，我们替你出钱修被你撞坏的车。打个比方，你追人家尾了，我们给你出钱修被你追尾的车。如果人家追了你的尾，就该由给追你尾的汽车上保险的保险公司赔你修车费。明白了吗？你的这件事，应该由撞你的那辆车的车主找他投保的保险公司给你修车。”

我说：“撞我车的人溜了。我到哪儿去找他？”

胖女人说：“你的车停放在收费停车场，他们当然有责任看护你的车。退一步说，他们也应该向你提供撞你的车的牌照号码。他们就知道收钱！去告他们！”



IPILU
皮皮魯

第一 决向保险公司理赔

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

我将这首诗篡改了几句后，再不生保险公司的气了：四处奔波为理赔，让它三千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

写这篇小文时，我偶尔看见一张 1997 年 11 月 1 日的《人民日报》，上面有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是这样写的：“今年 4 月至 9 月底，从深圳空港出发的很多旅客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购买的航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竟是一纸空文。”我再多转述，就有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嫌疑了，愿意看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找报纸看。无巧不成书，在结束此文时，我又碰巧见到一张 1997 年 12 月 2 日的《中国消费者报》，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这样的：《警惕：保险推销中的陷阱》。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保险陷阱，在一个保险期内，如果不发生保险事故，一般的投保人是很难识破的……”

这时我才顿悟，原来 5 年前我是从陷阱里脱险的。我庆幸自己没有重蹈覆辙。每每遇到披绶挂牌的保险公司推销员甜言蜜语天花乱坠地动员我投保时，我都只说一句话：我好不容易才脱险。

弄得人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第一次与狼共舞

我的童年是在对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深恶痛绝中度过的。当我 15 岁服兵役首次填表时得知自己的祖父的成份是“富农”时，幼稚的我无异于遭受了一次天崩地裂。在我内心世界的天平上，父亲的“革命军人”桂冠似乎不能抵消祖父的“罪恶”。因祖父的富农成份而产生的负罪阴影自始至终笼罩着我 5 年的服兵役过程。曾有一位贵为团小组长的河南籍老兵找我谈话，他拜托我同富农祖父划清界限。

麻烦出在我见过祖父，那是一个慈眉善目的乡村郎中，分明不是青面獠牙的坏蛋。那时的我，灵魂尽管被扭曲，但心目中的坏蛋和现实中的坏蛋的反差还是使我对“成份”这一全凭遗传一锤定音的界定优劣的方法产生了怀



PU
皮皮屋

第一次与粮共舞

疑。

那时我们的童话也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地给动物划分了成份：小白兔、小山羊、大公鸡等有幸被纳入“好人”的队伍，而大灰狼、狐狸、老鼠等则划入“坏人”的行列。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居然还有中间人物：猴子、猫、猪等等。我们的孩子从小被这样的童话误导，我们的国家于是就有了适合产生十年浩劫的土壤。

国家改革开放后，选择写童话作为谋生手段的我萌生了创办一本名为《大灰狼画报》的低幼童话刊物的想法。笃信“只有想不出来的事没有干不出来的事”的我开始寻找出版社合作。一位出版社总编辑在听了我的创意后吃惊地说：“怎么能用大灰狼当刊名？大灰狼是帝国主义的象征呀！”

在几次因刊名遭到有使命感的同行的拒绝后，1986年5月5日下午，我在山东烟台结识了21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当我在认识他的10分钟内说出想办一本以学龄前儿童为读者对象的名为《大灰狼画报》的低幼期刊时，我看见他眼睛一亮，我知道一拍即合了。我不得不佩服张秋林的快速判断力。老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我说，准确的判断力也是成功之母。

有这样一个故事：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



第一次与粮共舞

说，我该退居二线了，由他接任主编。他不同意。我说那我就当名誉主编吧。从1997年4月号起，张秋林接任《大灰狼画报》主编，我为名誉主编。

我笔下的大灰狼罗克最早是以连环画形式从《大灰狼画报》创刊号起在该刊连载。随着罗克的读者的年龄的增长，他们不满足于通过连环画与大灰狼罗克“共舞”了。在读者的要求下，1995年，我将大灰狼罗克“提拔”到《童话大王》月刊以文字形式与读者见面。《大灰狼罗克》目前共有228集。

大灰狼罗克堪称一匹后来居上的耀眼黑马，一跃而成为我的童话王国中的第5号人物，彰显尊荣。

与狼共舞，其乐无穷。



第一次看书

我从1岁起开始看连环画，那时叫小人书。我看第一本字书的时间是1964年，我9岁。当时我父亲在国防科委工作，他经常往新疆那个方向出差，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国家的核基地在那里，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在那儿起爆的。父亲有个很不错的习惯，每次出差回来都给我们带礼物，比较常见的是葡萄干和哈密瓜，有时是玩具。我曾记得父亲一次出差回来带给我和弟弟的是一枝电动冲锋枪，很是令邻居的小朋友羡慕嫉妒了一阵。作为一家之长，在远离家庭一段时间后回归时，给家人特别是孩子带礼物，是比对孩子讲大道理更能使他们爱这个世界的办法。

1964 年 5 月，我父亲去新疆出差回来带给



PIPILU
皮皮魯

第一次看书

我的礼物是一本字书，书名是《小马馆和大皮靴叔叔》。

“我能看字书了？”上小学二年级的我对自己的阅读能力还缺乏自信。

“能看。”父亲鼓励我，“不能总是看小人书呀。”

我开始尝试阅读字书。碰到不认识的字或问父母或查字典或跳过去。字书在我眼前展现了一个可以无穷无尽发挥想像的场面，这是过去看一目了然的连环画时所没有的感觉。《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说的是打日本鬼子的事，书中的一些情节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从那以后我就鸟尽弓藏将小人书打入冷宫，移情别恋迷上了字书。

看完《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后，我有了看字书的瘾，我不能守株待兔等父亲出差再给我买书，我主动出击向父母要书。而父母对于我的买书的要求总是尽量满足。我小时候看过的不少书，我的父母至今还珍藏着。有《儿童团的故事》、《高玉宝》、《钢铁小战士》、《小武工队员》、《二十响的驳壳枪》、《刘文学》和《郑师傅的遭遇》等。

1979年夏天，初学写作的我作为文学新人有幸被邀请参加了一次笔会。在会上，专程来



觉得作为望子成龙的父母为了保险起见，应该尽可能给孩子全面的营养以防万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孩子看课外书大开绿灯。

其实我看过的书并不多，算来算去从小到大囫圇个看完的书绝对没有超过 150 本。我戏称自己写的书比看的书多。我小时候看书比较善始善终，从头看到尾，给足了作者面子。成年后再看书就虎头蛇尾了，很少把一本书看到寿终正寝。我写作 20 年来，自始至终看完的书也就 20 本，而且经常是一本书马拉松似的看好几年。我现在的看书习惯是拿到一本书先随便翻开一页，看上 5 分钟，如果不能吸引我，我就判它死刑了。对于书，读者真是至高无上的大法官，再大的作家也没辙。

我觉得成年人读书不能过多，读书过多导致大脑懒惰。哲学家叔本华说：“我们读书时，是别人在替我们思想，我们只不过重复他人的思想活动而已。我们的思想活动在读书时被免除了一大部分，在我们暂不自行思索而拿书来读时，会觉得轻松，然而我们的头脑却成为别人思想的运动场了。”

我觉得读书有两个作用：一是获取信息，充实生命。一个人的经验毕竟有限，通过书籍获得别人的经验扬起你生命的风帆，何乐而不为？二



PIPILU
皮皮魯

第一次看书

《金蔷薇》肯定是被心胸狭窄的作家怕同行看了写作水平超过他们而囤积起来了。时至今日，我依然无缘拜读《金蔷薇》，这肯定是我的作品的读者迟迟不能逾亿的根本原因。不过以我现在的经验，如果有人拿你没看过某本书来嘲笑或羞辱你，你千万别自卑。起码在咱们这个星球上，没看过哪本书都不可能妨碍你获得人生成功。自人类有文字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本书是非读不可的。据说《金蔷薇》是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一位作家的创作谈，曹雪芹、李白甚至列夫·托尔斯泰可能没看过这本书。

1986年5月，我到烟台参加一个什么会。一天会议组织者带我们去一处参观，好像是个炮台。在大轿车上，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老太太。旅途中感到百无聊赖的我请教她姓什名谁，她说她叫颜一烟。当我得知她就是生平看的第一本书的作者时，我对她立刻肃然起敬，我还怀着感激之情很是感谢了她一番。颜一烟淡泊名利，几乎不参加文学界的任何活动，久而久之，文坛的人几乎忘记了她。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说：“写作是一种孤独的生涯。作家的组织虽可以减轻一些孤独感，但我怀疑这对作家的提高是否有好处。”时下文坛每年都有很多名目的会，一些人热衷



PIPILO
皮皮露

第一次挣稿费

文字作品是写给读者看的。在商品经济社会，读者阅读他人作品，要花钱买。文字作品以商品的形式进入流通领域，这个不争的事实恐怕是再清高再有使命感的作家也不得不认可的。因此，作家的作品以书籍为载体发行后，作家从营业额中获得稿费是天经地义的事。

在 1966 年到 1976 年的 10 年浩劫中，中国大陆上演了许多极富童话色彩的闹剧，其中之一就是取消稿费。写文章写书发表了出版了却不给稿费，这在今天看来是天方夜谭的事，在当时却是毋庸置疑的。好在当时的作家大都被剥夺了写作和出书的权利，那时流传一句话，叫做“8 亿人民 8 个样板戏 1 个作家”。这 1 个作家指的是浩然，那时几乎只有他的《艳阳

第一次抄稿費



第一次挣稿费

总编曾给一位作者预付 1 万美元稿费，让该作者在一年内写任何文章，不管多少，甚至不写！风靡全球的美国《读者文摘》的创办人华莱士给该刊所选用的千字文章定的稿费标准是 2500 美元。有一次，华莱士为了一篇好文章，他竟然给作者开出了 1.5 万美元的天价。美国《读者文摘》争取了第一流的作家，好稿因此源源不断，发行量与日俱增。1996 年第 10 期中国《读者》月刊选载了我的《奔腾验钞机》精彩语言辑录，至今我未收到 1 分钱稿费。我觉得这可能是为什么在有 12 亿天文数字人口的地盘上出版的中国《读者》的发行量却远远不如美国《读者文摘》的一个原因。

我有时想，假如是同样水平的两位作家，一位在中国大陆，一位在美国，他们所获得的稿费肯定有天壤之别。美国出版商不是傻子，他们付给作家那么高的稿费，绝不会赔本赚吆喝，肯定拿大头的还是出版商。那么中国大陆作家应该获得的那部分稿费流入了谁的腰包呢？答案只能是装进了出版社的腰包。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随着《著作权法》的实施正在改变。版税制是国际流行的付酬方式，也就是作者从书籍的总定价中按百分比抽取稿费。国际上通行的版税标准是：书的印数在 1



第一次掙稿費

己的作品《呐喊》和《中国小说史略》交给出版商李小峰经营的北新书局出版，双方商定以版税的形式支付稿费。开始李小峰支付鲁迅的版税还比较守规矩，然而从1927年起，出版商开始对鲁迅耍花招了。对于出版商屡屡拖欠版税和隐瞒印数忍无可忍的鲁迅终于在1929年8月13日拿起了法律的武器，聘请律师杨铨和北新书局对簿公堂。李小峰向鲁迅赔偿后，鲁迅为了控制出版商的印数，提出北新书局在今后印制他的书时要实行印书证制。所谓印书证，就是出版商在每本印制的鲁迅著作的版权页处必须贴上由鲁迅自己设计和制作的印书证，鲁迅以此监督出版商以达到确保自己的稿费不被出版商鲸吞的目的。自古中国的文人信奉“君子不言利”，甚至有“清贫是文人的本色”的滑稽之说。鲁迅和胡适等文学大师从“不言利”到“言利”的转变，体现了人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后文人观念的变化。当年胡适给自己的书制定的版税率是初版15%，再版20%，低于此标准，坚决不出。20%是一个令今天的美国畅销书作家也不得不为之汗颜的版税率，可见胡适先生一旦觉悟，起点之高。中国作家能拉下脸来为稿费与出版商争得脸红脖子粗，大都有一个从不好意思到好意思的进步过程。鲁



迅那次赢得官司后，于1929年8月28日在上海南云楼请客，笑逐颜开地同出版商李小峰化干戈为玉帛。出席作陪的有林语堂和郁达夫等。席间，林语堂对鲁迅打官司争稿费的作法颇多微词，发展到两人争吵，餐桌上顿时狼烟四起。以至于当天的鲁迅日记有如下记载：

“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讽，直斥之，彼亦争执，鄙相悉见。”以林语堂留洋多年思想之开化，在稿费问题上却比鲁迅醒悟晚，由此可见中国作家被传统思想束缚之深刻。

我们的作家和出版社之间缺乏一条纽带，这条纽带就是文学经纪人。在发达国家，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有 85% 要归功于文学经纪人的运作。文学经纪人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们能在半个小时内通读一本书，而且马上就能判断出这本书是否会受读者欢迎。他们代表作家和出版商讨价还价，然后大笔一挥就替作家签署了上百万元的出版合同。在国外，文学经纪人对文坛了如指掌，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琢磨什么样的作品畅销，他们跟踪所有报刊和文学杂志，给畅销书作家建档案，交朋友。他们既为作家服务，也为出版商效劳，还缓冲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文学经纪人因此成为百万富翁的比比皆是。我有时纳闷，我们国家目前有上



PILU
皮皮魯

第一次稿酬費

千万下岗失业的人，每年毕业的近百万大学生也为找工作伤筋动骨，怎么就没人去填补文学经纪人这个空白呢？其实中国遍地都是钱，怎么大家就视而不见没人动脑子捡呢？

有一次，我和一位外国作家交谈，我说你们的稿费比我们高。他说你们中国作家写不写作品都有工资，不用为生计发愁。他指的是我们的“驻会专业作家”。中国大陆每个省和直辖市都有作家协会，每个作家协会都有数量不等的“驻会作家”。中国目前大概是世界上唯一由政府出面拿纳税人的钱供养“专业作家”的国家，而中国的文学却没见得因此比国外繁荣多少。我们的“专业作家”可能还以此为荣，由此读者经常可以在“作者简介”中见到诸如某某人是“驻会作家”的明显带有炫耀色彩的文字。作家不能靠稿费为生却要按月领取纳税人的钱，起码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光彩事吧？据说著名作家巴金 1949 年后虽然贵为“专业作家”却拒绝领取 1 分钱工资全凭稿费吃饭。1998 年 3 月，新任总理大刀阔斧地誓将全国 8 百万官员“腰斩”为 4 百万，昔日的全国 15 人养 1 个官员变成了 30 人养 1 个官员，老百姓的负担由此减轻了一半。鉴于 400 万官员都能在一夜之间削官为民，由此我估计“专业作家”这一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历史遗



瘤被割除的日子为期不会太远。作家应该当纳税人，不应该吃纳税人。“驻会专业作家”体制是近 50 年中国文学不能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众多作家不得不只靠稿费为生不写就没饭吃写不好也没饭吃时，中国文学的春天必将仙然而至。亚当·斯密的那句“市场有一只无形的手”的名言，同样适用于文学。只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能将中国作家送进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大厅，其他招数包括“驻会作家”体制都没戏还可能南辕北辙地把我们的作家往相反方向葬送。

其实，靠稿费为生应该是最值得作家自豪的事。真正写好了，读者怎么会不掏腰包呢？依我看，“作者简介”中顶级牛气的文字当属“自由撰稿人”。

我们国家人多，相对来说就业机会少。如果能有更多的人靠写作为生，既繁荣了文学，又为政府排忧解难，还为图书市场创造了就业机会，何乐而不为？不过，以我们今天学校的语文教科书和应试教育体制，产生作家实属不易，只怕再大的作家胚子也被毁了。



第一次写歌词

我 15 至 20 岁时在空军歼击机部队服兵役，具体工作是维修歼—6 飞机说白了就是米格—19 飞机上的机关炮瞄准具弹射座椅信号枪火箭弹炸弹架之类的物件。我不知道国外的军人爱不爱唱歌，反正我服兵役的年代中国军人特爱唱歌，唱的当然都是趾高气扬荡气回肠的歌曲。每逢开大会前，单位之间都会有此起彼伏的拉歌，相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对于诸如“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等等叫板过招儿专用术语都会耳熟能详。当时甚至连西皮流水的京剧（所谓样板戏）都能作为歌曲供数百人在一人用手打拍子指挥下齐唱。大凡遇到这样的场合，飞行员就会唱《我爱祖国的蓝天》的飞行员之歌，而我们地勤兵则比较尴尬，我们没有自己的歌。

第一波写数词



1976 年我结束服兵役回到北京。1977 年，初学写作的我想在文学体裁的各个领域轮番尝试一下自己的才能，以确定自己这辈子靠写什么吃饭。轮到试歌词时，我猛然想起地勤没歌，于是我在 1977 年 7 月 24 日下午写了一首名为《地勤战士之歌》的歌词。我有一个写歌词的朋友在总政军乐团当创作员，叫王晓岭，当时他创作的《三唱周总理》捧红了歌手韩芝萍后蔓延得满大街都唱，特火。我拿着《地勤战士之歌》骑自行车从学院路到车道沟的军乐团驻地找王晓岭，请他据此判断我能否靠写歌词丰衣足食地安度余生。我骑到首都体育馆十字路口时，碰巧看见从军乐团骑自行车出去办事的王晓岭。王晓岭蹲在路边看我的处女歌词。看完后，他很是鼓励了我一番，说歌词先放在他那儿。

1977 年 11 月 7 日，我意外收到了《解放军歌曲》编辑部寄给我的一本名为《歌词》（第 8 集）的内部刊物，《地勤战士之歌》赫然刊登在上边。原来，拿到我的歌词的次日，王晓岭就将它推荐给了《解放军歌曲》编辑部。后来，在山西省军区服兵役的我父亲将儿子的歌词拿给当时在省军区宣传队任手风琴演奏员的臧云飞，请他谱曲。届时尚未在作曲界出道的



PILU
皮皮鲁

臧云飞为《地勤战士之歌》谱曲后，他左看右看不满意，自己给枪毙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那首歌词水准实在不高，使臧云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不他今天怎么能谱出脍炙人口的《一二三四歌》和《当兵的人》？再后来，我不认识的一位据说是沈阳军区的作曲家吉时哲为《地勤战士之歌》谱了曲，刊登在1978年第8期《解放军歌曲》上。据我的仍在服兵役的战友来信说，他们很是满怀豪情地唱了一阵子《地勤战士之歌》。

《地勤战士之歌》在解放军歌曲编辑部编纂的内部刊物《歌词》上发表后，1977年12月13日中午，王晓岭在北京莫斯科餐厅宴请我以示祝贺。这种为别人推荐作品发表后又请别人吃饭的事，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今天，作为童话的素材写出来都不会有人相信。首战告捷后，我却金盆洗手，没有再写歌词。笃信毛泽东“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箴言的我在歌词领域自叹弗如竞争不过王晓岭，无论作品还是人品。万般无奈下我只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宁为鸡口毋为牛后地去写童话了。

王晓岭现任解放军战友歌舞团团长。诸如臧云飞、于文华、刘斌等大腕儿都是他手下的兵。我揣测，在王晓岭手下当兵不会度日如



第一 决写歌调

旗的妈妈时，只有小学文凭生怕对方相不中俺的我，拿着 1978 年 8 月号《解放军歌曲》拉大旗作虎皮色厉内荏地当敲门砖，居然化劣势为优势以男性小学学历成功高攀非残疾人女性大学学历，创造了中国现代婚配史上的奇迹。

《地勤战士之歌》当属头功。我有时想，假如没有当初的《地勤战士之歌》，会有今天的郑亚旗吗？人生实在奇妙。

现在的年轻人和孩子大都喜欢歌曲，有的甚至加入追星族，这是我们的生活日渐丰富多彩的表现。一首好歌，歌词的感染力首当其冲。我看到 1998 年 3 月 16 日西班牙《论坛》周刊说，该国最受青年人欢迎的极硬乐队在其演唱的歌曲中有这样的歌词：“我飞不需要翅膀，宁愿要迷幻药。”如此通过歌词规劝歌迷吸毒，实在是误入歧途误人子弟。我至今喜欢看歌词，每当我得到一盘新的 CD 或录音带时，我都会先看套封上微雕般的歌词。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觉得这是自有人类文化以来最伟大的一句歌词。遗憾的是我们有的国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整天听唱如此惊心动魄力拔山河的国歌却不能身体力行。

学生不是老师的奴隶不是分数的奴隶；孩



子不是家长的奴隶；家长也不是孩子的奴隶；
员工不是老板的奴隶；百姓不是贪官的奴隶；
人肺不是汽车尾气的奴隶；消费者不是奸商的
奴隶；企业不是政府管理机构的奴隶；人不是
金钱的奴隶不是文凭的奴隶不是名牌的奴隶不
是私人轿车的奴隶不是住宅的奴隶不是配偶的
奴隶……

天马行空写到这儿，我似乎只能用我们无与伦比的国歌歌词为这篇随笔画句号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你现在是否感受到这句歌词的震撼力量？其威力不亚于原子弹。其实中国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拥有原子弹了，不是物理学家制造的，是歌词作家制造的。画句号之后的这段话实属画蛇添足，败笔。可我懒得删了。都说有缺点的人才可爱，文章亦如此？

既然已经画蛇添足了，索性就破罐子破摔画蛇添足到底，反正是无拘无束没有章法的随笔。世上还有一段我特别喜欢的歌词，转述如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真的不能再写了。



PIPILO
皮皮魯

第一次存款

第一次存款

储户到银行存款的实质是储户借钱给银行。储户因存款而成为银行的债权人，银行因接受存款而成为储户的债务人。

我生平第一次借钱给银行是在 1972 年 5 月 21 日。

1971 年是我服兵役的头一年，也是我有生 15 年以来头一年自己挣钱，月薪 6 元人民币，年薪 72 元人民币。憋了 15 年终于能挣钱了的我，自然会极尽享受花自己挣的钱的快感，我将第一年的全部 72 元年薪奢侈地挥霍一空，故未借款给银行。

1972年，我的月薪猛增到7元，年薪84元。通过学习马列著作尤其是得益于指导员的辅导，茅塞顿开懂得了应该过俭朴生活的我，



决定借钱给国家银行。当时我在江西向塘机场维护歼击机，我们部队的驻地叫丁坊。1972年5月21日，我将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近一个半月收入计10元钱存入丁坊储蓄所，因此我得到了一张活期存折。存折封面套红印着毛主席语录，内容是：“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两个中国之命运》”。封底亦由毛主席语录占据全部版面，内容是：“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封底上这条毛主席语录没有像封面那样注明出处，但是有毛主席的手迹印刷体签名。存折上的储蓄所全称是“中国人民银行南昌县支行丁坊分理处”。代表银行向我办理借款手续的工作人员名为“李善根”和“靳维荣”，这是我从他们留在存折上的印鉴中获得的信息。

诸位看官可能会惊讶我的记忆力，其实不然。如此准确的描述源于我至今珍藏着这张存折。近年来收藏热在神州大地风起云涌，五花八门收藏什么的都有。自幼崇尚独辟蹊径的我为自己独具慧眼囤积居奇地收藏了一张印有毛主席语录的银行存折而傲视众藏家，我甚至一厢情愿地认定中国收藏有这样的存折的人不会



IPILU
皮皮鲁

第一決存款

几天下班时她发现我那张港币存单被她多写了一位数，500 成了 5000！她不能承担此损失于是就根据存单上储户留的地址在男友的保驾下登门索要存单。我找出存单一看，确实如此。我答应她次日去银行更换，她由此一反银行职员常态感激涕零态度可人。不过我对于她按图索骥依据储户在存单上留的地址找上门来的作法十分反感，特别是还携带着非银行工作人员的不知有否前科的业外男性。储户的住址和存款数额一样，都是秘密，银行工作人员不该随意泄露。他们走后，正好《北京晚报》的记者苏文洋来电话，我顺便告诉他此事，没想到苏文洋邂逅天上掉下馅饼似的兴奋异常，非要我将该错版存单借他一用甚至开价 2000 元人民币买也在所不惜。苏文洋告诉我最近有个老人向他们报社投诉，说银行将老人的存单少写了一位数，老人回家发现后找上门去，结果银行死不认帐还原则性极强地说银行的规矩就是一切以存单为准。苏文洋企图以我的这张存单为人质逼迫那同属一家银行管辖的储蓄所就范改邪归正。想起刚才那银行女职员挤给我看的一滴眼泪，一向崇尚见义勇为并处事果断的我这次经过一番优柔寡断举棋不定竟然没有同意。苏文洋在电话那边捶胸顿足，大骂我是懦夫而且



PIPLU
皮皮魯

第一次存款

有一次我去一家银行借钱给他们，营业员在清点过钱后告诉我说多了一张百元钞。从此我一旦有了闲钱只借给那家银行。

如果不将提高银行职员的素质作为首要内容纳入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没戏。

写这篇随笔的前一天，我有意携带一笔经过精心选拔的脏乱不堪其丑无比的小钱居心叵测地光临一家储蓄所找茬儿，为我的文章充实素材。我的身上还暗藏杀机地配备了极具法律意识的微型录音机。遗憾的是我无功而返。但我高兴。

说到存款似乎不能不说人与财富的关系，但是这种话题很容易堕落为恶性说教，我索性偷懒摘录几位名人的语录以飨看官，就像当年银行在存折上印毛主席语录犒劳储户那样。

安德鲁·卡耐基是美国白手起家的钢铁巨人亿万富翁，他说：“一个人在分配和花费靠自己的努力赚来的钱财时，一定比投资和花费他人财富要仔细得多，这一点对我来说，显而易见。赚取财富的人，才应该享有明智运用此笔财富的机会。从来没有赚取过大笔财富的政府官员，在分配靠税收获得的财源时，对于财富的开销是不能够作出明智的抉择的。”

我时常在媒介上看到我们的某些官员投资



PIPILO
PERM

第一次存款

我时常在报刊上看到自诩清高的文人志士面对市场经济狂潮大发“我视钱财如粪土”的铮铮誓言，每每使我自惭形秽，甚至还产生了既然钱财是粪土银行就是化粪池存单就是擦屁股纸的不应该有的齜齜联想。读了先哲培根的话，我才如梦初醒般地将银行从化粪池中打捞出好生洗涮后将其回归定位。其实，我之所以对版税和稿费斤斤计较，实在是为了早一天在“清晨傲然自语”地说“这一天是我的”。也为了早一天不将如蜉蝣般短促的生命“去奉承那些卑鄙的恶棍”。

我将不去奉承恶棍的希望寄托在我珍藏的印有毛主席语录的存折上，我希望日后它能脱颖而出拍卖一个好价钱。

不管怎么说，我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南昌向塘机场丁坊储蓄所的债权人，虽然只借给了他们1角8分钱，但这一借就是26年，相当于3场抗日战争外加中场休息。



第一次看儿子发表作品

1983年7月，我的儿子郑亚旗出生不到1个月，我父亲第一次见亚旗时对我说：“你的儿子可能不如我的儿子。”

反应迟钝的我先是一愣，心想哪有头一次见别人的儿子说这种话的。待我回过味儿来，便对父亲说：“我希望我的儿子比你的儿子强。”

父亲对我说：“我的儿子比你的儿子强，我高兴。你的儿子比我的儿子强，我更高兴。”

希望儿子比自己强，恐怕是普天下父亲的共同心态。人获得成功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先天条件，说白了就是遗传。另一个是后天条件，也就是教育和生活环境。遗传基因很难凭



**PIPILY
A REE**

第一波看儿子发表作品

父亲们的主观意识展开竞争，纵观天下望子成龙的父亲们，他们之间竞争的只能是后天这一块。

不管承认与否，事实上，从我的儿子出生之日起，我便加入了同其他父亲竞争的行列。竞争什么？竞争谁的孩子长大有出息。经过调研经过分析经过由表及里，我发现人类只有两种思维方式：创造性思维和复制性思维。我认定在这个时代只有创造性思维是能够导致孩子日后出人头地的基础，而创造性思维同压抑和限制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于是我为自己的孩子制定了“无为而治”的教育方针，说通俗了就是不管，顺其自然，将束缚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最大限度地培养孩子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我以为创造性思维能力是可以培养出来的，比如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汤姆森和欧内斯特·卢瑟福通过创造性思维训练一共培养出 17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于是，郑亚旗得以生活在一个极其宽松和自由的环境里，他自幼无需像别的孩子那样必须称呼父亲为爸爸，他获得了对父亲直呼其名的特权，他生长在发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国土上却全然不懂什么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从小就被我灌输“分数是世界上最不重要的东西”的观念，我还不厌其烦地



PIPILO
皮皮里

第一次看儿子发表作品

昨天晚上被他女儿玩出毛病的。崔永元说他太太嗔怪他在教育孩子上受郑渊洁毒害太深。我说看来我已经臭名远扬了。

如果一个1岁多的孩子依靠自己的独立劳动能使一个物件发出声音或图像，他肯定会产生自己能驾驭世界的强大自信。事实证明我在教育方针上没犯太大错误。当电脑进入家庭后，郑亚旗可以说是无师自通地以令我目不暇接的速度迅速征服了电脑，这和他从不到1岁起就玩录音机肯定有关系。早就用笔写烦了屡屡生出搁笔念头的我，被儿子说服改用电脑写作后，写作的兴趣起死回生，且数量大增，以至于《童话大王》不得不扩版增加页码，直接受益的自然也是百万读者。有一次，《世界军事》杂志主编的电脑出了问题，郑亚旗去他家很快就解决了。还有一次我接电话，对方说找郑老师。我大言不惭地说我就是。对方说不是你，是郑亚旗。我说你是谁，怎么能管乳臭未干的郑亚旗叫老师？他报上他的大名，说是找郑亚旗郑老师请教电脑上网的问题。他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我赶紧诚惶诚恐地叫“郑老师”接电话。郑亚旗还和几个网友成立了一个专门为企业编主页的工作室，时不时和同人碰头开会研究业务，像真的一样。有时我想，假



如我的儿子从1岁起就摆弄大哥大，他今天在电脑领域绝对比现在更酷。我很嫉妒崔永元的女儿。

尽管儿子驾驭电脑得心应手，但我内心尚有一丝不安，这就是他的语文水准。自打儿子出生，我最担心的就是孩子被应试教育毁了。我尽我的最大努力不懈地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受或少受应试教育的摧残。在实行双休日之前，我几乎每个星期都编造种种理由为儿子请假1天，让他逃避应试教育的摧残。在应试教育的所有课程中，我认为语文教育最毁学生，那种八股作文的训练绝对只能培养学生的复制性思维定式，而复制性思维的习惯一旦养成，对孩子的前途来说是灾难性的。自幼生活在无拘无束环境中的亚旗，上学后如果不对僵化的语文教学产生顽强的抵触，那只能说明我的教育是失败的。事实证明我的教育比较成功，于是他便顺理成章地对语文尤其是作文反感。生怕孩子被八股作文毁了的我们，认定自己免疫力强，于是奋不顾身为他写作文。我经常在书籍报刊上看到父亲如何如何爱孩子的催人泪下的文章，我在为儿子写作文时，很为自己感动，我觉得在应试教育体制下，这才是真正惊天地泣鬼神的父爱。遗憾的是我写的作文在孩子的老



PHILIP
C. 皮皮羅

第一决看儿子发表作品

师那里总是通不过，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我的作文受到今天的老师的好评，那么我的作品肯定不会拥有读者。无奈之下，我只好求助于我们家的小保姆，好在她写的作文在亚旗的老师那里获得了通过，于是，亚旗在6年的小学生涯中的所有作文都出自小保姆之手，为此我们多付了她不少工资，开始时每篇作文10元，后来随着物价的上涨，每篇涨到35元。亚旗上小学几乎没自己写过一篇作文。

我知道一个会摆弄电器数学也不错但连起码的文字能力却不具备的人不会被社会承认。我认为提高写作水平的最好办法是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从亚旗上三年级起，我开始向他推荐《水浒》等名著，他翻了几页竟然说看不下去。屡次失败后，我慌了。我清楚，八股作文孩子可以不写，但文学书不可不看。上小学期间，郑亚旗只看卡通连环画，连我的书都不看。有一次我登高帮他收拾玩具柜的顶层，高高在上的我让他递给我一本没用的书垫一件玩具，他调侃道：“那就是你的书了。”我当时想出了“没有距离就没有崇拜”这句话，后来写进了《皮皮鲁和红桃老K》。最后我不得不采取不光彩的强制手段让他读我的书，我威胁他说如果你不读，今后就只有你自己写八股作文



PIPILO
 小皮匠

第一次看儿子发表作品

认，我看不懂这篇专业性比较强的文章。我问儿子什么叫阿猫阿狗？什么叫全攻略？儿子给我扫盲说，《阿猫阿狗》是一部电脑游戏的名称，“攻略”是玩游戏的技巧也就是指南，

“全攻略”就是从头到尾玩完这部游戏的全部技巧指南。我说你怎么会想起写这篇文章？儿子说，游戏攻略的文章在电脑报刊上很多，他每新玩一部游戏，总习惯参考报刊上的攻略。这回他买了《阿猫阿狗》游戏后，发现报刊上还没有该游戏的攻略，于是他就边玩边总结经验写了攻略，给别人“指南”了一回。我说我怎么没看见你给编辑部寄稿？他说郑渊洁你太落后了，我们现在寄稿可不像你们那样刀耕火种，我敲几个键通过因特网就发到编辑部去了。我问他认识编辑吗，儿子摇头说不认识。我看了该版的责任编辑的名字，叫“朱方”。我告诉儿子，应该记住处女作责任编辑的名字，他说知道，又说他没打算吃写作饭，还说郑渊洁你别太累，在这方面望子成龙戏不大。

那几天我终日处于兴奋之中，说实话我并不指望儿子“子承父业”，我只是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不再为儿子不会“写字”而自责了。毕竟他第一次写字就把字写到报纸上去了。数日后，《中国电脑教育报》给亚旗寄



PIILU
皮皮露

第一次参加评职称

第一次参加评职称

1987年，我在北京市文联一家刊物的编辑部供职。11月，文联上上下下都在议论本单位近期将进行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评职称。职称是有数量限制的，而全单位的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都没有职称，这就形成了狼多肉少的局面。竞争是残酷的。

一向对于初中以上各级文凭不屑一顾并将其拒之门外的我，自然对于职称丝毫不感兴趣，我决定不参加评职称。

11月24日，北京作家协会花钱组织作家住在位于北京大学西侧的畅春园饭店学习中共13大文件，我和文联副书记Z先生同住2005房间。入睡前，我们聊到这次评职称的话题，我说我不参加。Z先生赞许说，郑渊洁你根本不需要



PIPILU
PIPELINE

第一次参加评职称

而我自己清楚我根本不可能及格，这就意味着我连报助理编辑的资格都没有。

“我不参加评职称。”我通知 G 先生。

“不参加也得考试。将来正规了，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不能从事编辑工作。没有职称更不行。你还是参加考试吧。”G先生奉劝我。

我才知道“惹不起躲得起”这次行不通了，这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涉及到饭碗，问题就变得严峻了。在 1987 年，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还要受“单位”的束缚，马虎不得。尽管如此，我耳边还是不断响起“士可杀不可辱”这句话。

次日上午我到一位朋友 H 女士家送稿子。H 女士夫妇俩都是某出版社的编辑，我向他们说了我的“文化补习考试”境遇。

“郑渊洁，你们单位这次评职称允许报的最高职称是什么？”H女士问我。

“副编审。”我说。

“你就报副编审！依你的水平，当编审都富余。”H女士煽动我。

“这不是胡闹嘛，我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获得报评助理编辑的资格，你让我直接报评副编审？开什么玩笑。我连初中文凭都没有。”我笑。



PIPILO
心皮皮圖

第一次参加评职称

的主编总编副主编副总编和编辑部主任副主任)面对蛮文两眼一摸黑的无可奈何表情和场面,我觉得我的童话实在算不上童话。在我们的生活中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比我的童话童话。

又一日，M女士通知我，报评副编审需要
有两位已经拥有副编审以上高级职称的人写推
荐书。我翻通讯录，这才发现自己结交的大都
是贩夫走卒。百里挑一好不容易找出了两位教
授。2月10日上午，我给北京某名牌大学Z教
授打电话，请她和同校的P教授为我写推荐
书，两位教授爽快地联手帮我搞定了这件事。

此时此刻我的忍耐已经达到了极限。我对自己说，如果再需要办什么事才能评上副编审，我就退出评职称了。当时我正值创作旺盛时期，时间弥足珍贵。

1988年4月11日，文联开会宣布职称评定结果，有关人士向我颁发了一本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制的编号为“京出版000142”的《北京市专业技术职务证书》，证书上说：经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符合任职条件，具备副编审任职资格。落款是北京市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1988年3月14日。

这意味着我不会因为没有大学学历和职称而丢掉编辑的饭碗了。据说当时我是全国唯一



家操心，人家比你过得好，他们起码不会受盗版困扰。”

我无言以对。

按说评职称应该是一件严肃的事，可在我们这儿却变成了滑稽剧。细想也正常，职称似乎是对一个人学识和能力等级的认定，而学识和能力的真实魅力在于它的千变万化和独特性，怎么能往一个框子里套呢？真有本事的人，其与众不同的才华很难适应职称评定循规蹈矩的统一框架。伟大的哲学家康德生前长期评不上教授职称便是证明。再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特终生只有中学教师职称。由此看来，职称不等于称职。评职称往往成为没有真才实学的人证明自己有真才实学的一种手段，再加上职称和待遇、住房、工资的直接联系，评职称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商业行为，说得难听点儿，属于又当婊子又立牌坊性质。

文凭、学位乃至职称都是人为编造出来的一种类似于标签的东西，用以显示插上这些标签的人的学识和才能的与众不同。这些标签的获得程序一旦堕入工业化流程作业，它的真实度也就大打折扣了。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们的作家也评职称，有一级作家二级作家之别。给作家评级，

第一次参加评职称



第一次接触将军

第一次接触将军

将军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又能刺激想像力的字眼，区区两个字，透尽威武和神采。我小时候每看到这两个字，立即就会联想到千军万马和叱咤风云。然而我在生活中第一次接触将军，却有不同的感觉。

文革期间，敢于创新的中国人发明了五七干校。之所以使用五七作为校名，是因为毛主席在某年的5月7日发表了一项涉及干部政策的最高指示。五七干校即由此得名。以今天的目光审视当年的五七干校，其实质有点儿类似于劳改营。

1969年11月到1970年12月，十四五岁的我有幸随父母从北京到位于河南省遂平县的国防科委五七干校生活。该干校对外称“938部



PIPILU
皮皮露

第一次接触将军

来在北京的国防科委办公楼烧锅炉，现在又被遣送到干校。他的家人还在新疆，不能团聚。

将军！中国原子弹司令！我立即对他充满了好奇。我走到他的房间门口往里看他。坐在椅子上的他看见了我。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

“郑渊洁。”我说。

“你爸爸也是干校的？”他问。

“是。”我说。

“他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他。

“你可以帮我买包烟吗？”他说。

“可以。”我点头。

当时，中国的原子弹总司令没有权利离开房间出去买烟，我替他搞定了。

从此我每天都要到张蕴钰将军的房间坐一会儿，看着低矮漆黑的四壁和胡子拉茬的张司令，我找不着将军的感觉。他的目光善良，说话声音不大。我看出他孤独，他愿意和我聊天。他的随身物品只有一台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和几枝毛笔，他爱写毛笔字。

有一天，我走进他的房间时，他正在用毛笔写字。我过去看，纸上有两行字，是：

老泪流成河，



儿女乘船来。

“郑渊洁，你看得懂吗？”他问我。

“差不多。”我说。

“你说说。”

“眼泪流成一条河，儿女坐的船从眼泪河里开来了。”

他点点头，眼睛湿润了。

好几天，我注意到那张纸上就这么两行字。

数日后，他的妻子儿女从新疆来了。

从那天后，不知为什么“老泪流成河，儿女乘船来”这两句诗一直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岁月也不能将它们磨掉。

23年后，我看到了这首诗的后两句。1992年，张蕴钰将军送给我他刚出版的诗集《戈壁言情——张蕴钰将军诗词百首》，我才看到了这首名为《老泪》的诗的全文：

老泪流成河，
儿女乘船来。
牛棚教孺子，
少言休惹灾。

这后两句诗，我揣测张将军当年写出来后断然不敢放在桌子上，否则儿女可能会因此被迫乘船顺着眼泪河再回新疆去。



一位共和国的将军，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怎么随随便便就在一夜之间成了锅炉工呢？锅炉工还能与家人团聚，将军怎么却得将眼泪流成河才能盼来被隔离的亲人呢？

1967年7月23日，12岁的我在位于北京北太平庄的家门口玩时，目睹了一辆大卡车从我面前经过。五花大绑的彭德怀元帅被北京航空学院的大学生押在卡车上游街。由于彭德怀留光头，大学生无法通过揪他的头发强迫他抬头，他们就极具创造性地抓住彭德怀元帅的眉毛往起拽他的头。据说那天彭德怀的眼皮被撕裂了。

近闻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各种赞誉恭维不绝于耳铺天盖地，怎么就没人提文革的导火索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率先从北大点燃尔后才以燎原之势蔓延到全国直把中国烧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的呢？我总觉得真正的巨人不会遮丑，往伤口上撒盐是为了使伤口不再旧病复发。

安全感是一个国家的公民生存的第一要素，如果连将军和元帅都朝不保夕，普通百姓怎么活？我的外祖父刘润甫是京城颇有名气的中医，文革中被一群中学生抄了家，80余岁高



龄的他被中学生强迫长时间跪在炉灰渣上，很快他就与世长辞了。我的舅舅刘少甫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医生，他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因不堪忍受人格侮辱投玉渊潭公园的八一湖自尽，与作家老舍殊途同归。

法制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时代发展到今天，人人都应该活得有尊严。希望我们今天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无论如何不要重蹈父辈的覆辙。每每看到今天的老师挖苦学生打骂学生无视学生的人格尊严，我就后怕。我觉得这些老师是在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把学生往红卫兵培养。

张蕴钰将军是一位清官，他的最后官职是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相当于大军区副司令，可谓身居要职。九十年代的一个春节，我去看已经离休赋闲在家的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将军穿的棉袄的肘部竟然露出了棉花，而他刚刚向老家捐献了4500元钱济贫。张蕴钰将军的儿子曾对我说，他爸爸几乎从不让孩子使用他的专车。

每每从媒介上看到贪官被送上断头台，我就会想起张蕴钰将军身上那件露棉花的棉袄。康德说：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著地思考他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



PILU
皮皮鲁

第一次接触将军

鲜、有增无减的赞美和敬畏，那就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法则。

张蕴钰将军是一位儒将，他谙熟韵律诗文，离休后出版了4本著作。我引用他在其诗集《奚囊集》后记中的一句话：“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国独立于战争之外，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

这句话出自一位成功指挥引爆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将军之口，令人回味无穷。

只要中国远离战争，不管别的国家怎么打，都属于小打小闹范畴。

我现在一看到将军这个词，眼前马上就浮现出锅炉工、诗集、破棉袄和济贫善款，最后是一颗震撼人心的原子弹。

像张蕴钰将军这样的官儿，今天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



短处同别人的长处竞争，只会事倍功半，浪费生命。

我从1977年开始尝试通过写作谋生，我先是踌躇满志地写诗，后来逐渐发现打不过他们。打不过靠勤奋继续打是犯傻。我索性将所有文学体裁列队依次试打，看哪种体裁别人打不过我。我写过小说、歌词、科幻作品……甚至连漫画这个文学的远亲也不放过。结果令人沮丧，在这些不同的拳击场上，我一再被他们击倒在地，以点数计胜负好像只有一次。

1978年12月，我带着满身伤痕风尘仆仆地转战到童话的拳击场上试自己的运气和实力。当时我在北京一家工厂当工人，23岁。我给这篇童话起的名字叫《小蚂蚁在诚实岛的遭遇》，我从12月10日开始写，到14日完成，一共写了4天，共计13000字。

我将我的第一部童话誊抄了一遍，我实在拿不准它的水平。我决定将它寄给出版社，由编辑裁决。我当时认定编辑是文学拳击场上的裁判。时至今日我才明白文学拳击场上的裁判不是编辑不是评论家而是读者。

1978年12月22日，我将我的童话处女作寄给了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我在邮局一边寄稿件一边想，如果写童话还不行，我就该试相声



我的父母当时在山西太原工作，每逢春节我都去太原探望父母。1979年1月20日，我乘火车赴太原过春节。当我拎着提包离开工厂的集体宿舍经过传达室时，值班的师傅对我说郑渊洁有你的邮件。

郑渊洁随笔

由于要赶火车，我来不及将退稿送回宿舍，我就将牛皮纸袋塞进提包，带到了太原。这次退稿使我那个春节过得比较扫兴。后来我当编辑时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绝不在节日前夕给作者退稿。

• 142 •



PIPILU
皮皮魯

第一次写童话

帮我收拾东西。我的母亲叫刘效坤，当时在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做会计。她的一大嗜好是喜欢收拾东西。每当家人出门前，她都会把你的物品收拾得井井有条。家中更是一尘不染，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小到一根针，她都倒背如流。

“这是带走的？”母亲从我的提包里拿出装有退稿的牛皮纸袋子问我。

“不帶，沒用了。”我說。

“这是什么？”母亲问。

“我瞎写的一篇童话，出版社说写得不好，退回来的。”我说。

“你写童话了？”母亲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问。

“以后不写了，不是这块料，没戏。”我说。

母亲将牛皮纸袋子放在提包外边。

我离开太原后，母亲和父亲说起了我写的那篇童话。

“你给看看，万一写得不错呢？”母亲说。

“我可不懂童话，人家编辑都说不行了，准是不行。”职业为军队政治工作者的父亲认为隔行如隔山。



PIPILO
皮皮魯

第一次写童话

郑渊洁鼓劲儿。杨宗说遗憾的是《山西青年》不能刊登童话，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叫由岑，在北京《儿童文学》编辑部当编辑，他写一封推荐信，让郑渊洁拿着他的推荐信去找由岑。

我母亲和父亲再次去杨宗家，拿回《小蚂蚁在诚实岛的遭遇》和杨宗的推荐信。杨宗对我父母说，转告郑渊洁，写就写走向世界的童话，他还说郑渊洁有这个实力。

1979年2月下旬，父母将稿子和杨宗的推荐信寄给我。父母还在给我的信上极尽鼓励之能事，说杨宗如何如何评价我的这篇童话，让我尽快将稿子送给由岑。当时我看父母的信时满脑子只有一句话“孩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我觉得我的父母把自己的孩子拔得太高了。我当时还觉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肯定比《山西青年》的编辑看童话的水平高。

于是我将稿子连同杨宗的推荐信锁进了抽屉。

1979年4月，在各种文学体裁的拳击场上被竞争对手打得鼻青脸肿走投无路的我，想起了杨宗的推荐信。我就像泰坦尼克号上的落水者，将推荐信作为救命稻草抓住，做最后的努力。



4月21日，我向工厂请事假去找素不相识的由岑。我从学院路骑自行车到位于东四12条21号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由于此前我几乎没“光临”过编辑部，所以到了出版社门口我很是踌躇了一番才鼓起勇气对门房说我找《儿童文学》编辑部的由岑。

门房给由岑打电话后让我到传达室旁边的会客室等由岑，当时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还是一片十分老气的平房。由岑是一位30岁左右的女士，梳两条辫子。我拘谨地将杨宗的推荐信递给她，她看完信问我稿子带来了吗？我从军用挎包里拿出《小蚂蚁在诚实岛的遭遇》给她。由岑告诉我，她在编辑部是负责编散文的，不管童话。她会把我的童话转给编童话的编辑。她记下了我的工厂的电话号码，说有了结果就打电话通知我。整个会见没超过10分钟。

6月初的一天，我在工厂接到了由岑的电话，她说童话编辑对我的作品挺感兴趣，要和我面谈。我们将面谈的时间约定在6月6日。

1979年6月6日，我第二次“莅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比邻传达室的会客室见到了《儿童文学》编辑部负责童话的编辑刘庭华。由岑将我介绍给刘庭华后并没有离去，而



PIPILU
皮爾

表 15 周年纪念日。这天中午，我在北京香港美食城宴请杨宗、由岑和刘庭华。我将珍藏了 15 年的那 3 本纸已发黄的 1979 年 9 月号《儿童文学》送给他们，我不是用笔而是用真情在扉页上写了发自肺腑的感激之言。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我敬赠他们每人 5000 元《黑黑在诚实岛》伯乐奖金。

《郑渊洁童话全集》第19卷扉页上的照片，就是那天我们聚餐后的合影。

没有杨宗、由岑和刘庭华，可能就没有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和罗克。

当然，最最应该感激的，是我的母亲刘效坤。没有她，绝对不可能有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和罗克。是她在把郑渊洁推荐到这个世界上来之后，又不顾疲劳不遗余力地向这个世界继续推荐郑渊洁的才能。

第一次写童话



第一次请书法家题写刊名

刊物都有刊名，就像人有人名一样。刊名几乎无一例外都出现在刊物的封面上，大凡有印刷体和手写体两种。在崇尚伟人、领袖和名人的时代，不少刊物以拥有上述人等的手书刊名为荣耀。最近我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某企业非法集资的报道，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该企业的总经理立下一个规矩，凡本企业员工，能拿到政治局委员一级高官为企业题词的，奖3万元人民币。能拿到常委一级题词的，奖5万元人民币。商人的最高行为准则永远是利润，该老总能如此破费换取区区几个字，可见这些题词必然能为其赢得巨额利润。

一些刊物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喜欢请国家领导人题写刊名，辗转努力终于拿到手迹后还会



举社上下欢呼雀跃好生庆祝。同样一位领导题写的刊名，开始时给杂志社带来的是兴奋和自豪，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就变成了难堪和烦恼。

1980年，我从工厂被借调到《儿童文学》杂志社，工作是编辑童话栏目。该杂志社当时在位于北京前门东侧的共青团中央大楼10层。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不少报刊以能获得“英明领袖”华国锋题写的刊名报名为荣，我记得当时《文汇报》的报名就是华国锋的手写体。当年的华总理不像今天的朱总理那样坚决不题词，大概是有求必应，所以《儿童文学》也不例外，十分气派地用上了“华主席”亲笔题写的刊名。其实，从纯书法角度分析，“华主席”的字还是有值得商榷之处的，但是我们民族有个误区：似乎官越大，字越漂亮。好像职位越高，水平越高。书法水平并不特别高的华国锋自从出任“英明领袖”后，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第一书法家，他的题词铺天盖地遍及神州。

1980年11月下旬，《儿童文学》杂志社的上上下下开始为华国锋题写的刊名局促不安了，因为日前华国锋告别了“英明领袖”，成为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按说做人不该如此势

第一次請書法家題寫刊名



PIPI LU
皮皮魯

第一次請書法家題寫刊名

刊名字体，找一位既字写得好又没有特别大的名气的书法家题写刊名最安全。大家取得了共识后，才发现这样的要求难度比较大。写得好的书法家一般都名气十足，写得好没名的我们又无从知道人家姓什名谁。

我说我认识一位叫李铎的书法家，字写得
很不错，目前还没有特别大的名气，他似乎符
合你们的标准。

马振说郑渊洁你就去请李铎给咱们题写刊名吧，如果他写的不行，再找别人。

1980年11月24日晚上，我到位于西单附近的李铎家。我对李铎说，《儿童文学》的刊名是华国锋写的，现在不能用了。想请你为《儿童文学》题写刊名。李铎爽快地答应了。

李铎写字的桌子很大，像乒乓球台。白天李铎在上边写字，因住房狭窄，晚上李铎就睡在这张桌子上。

看着李铎写“儿童文学”，喜欢胡思乱想的我遐想当初华国锋写“儿童文学”的场景，我觉得很哲学。

“但愿你将来别成为国家领导人。”我开玩笑。

正在写字的李铎一笑。

“用你的字取代‘华主席’的字，是社会



PIPILU
皮皮魯

第一次請書法家題寫刊名

凭，那印制于 1968 年的小学毕业证书因有林彪语录而于 1971 年底被我开了天窗，打上时代的烙印，成为一件童话珍品。许多作家在写不出来时都依靠某种固定的习惯动作摆脱困境，比如托尔斯泰是通过摆弄纸牌寻找灵感。每当我写不出来时，我就拿出我的残缺不全的小学文凭看上一眼，立马就灵感如大江奔涌，一发而不可收。屡试不爽。

事实证明，当年对领导关于铲除林彪字迹和图片言听计从的人都属于鼠目寸光之辈，包括我。1988年，我同一位在《集邮》杂志工作的朋友闲聊，我问他什么邮票比较值钱，他说有一张毛主席和林彪亲密无间坐在沙发上的邮票还行。我猛然想起我小时候有这张邮票。我迫不及待地向朋友告辞，风驰电掣般骑摩托车去位于京郊的父母家找我小时候使用的集邮册。当我终于找到那张集邮珍品时，如五雷击顶，该邮票只剩下毛主席健在，林彪被剪刀执行了死刑。我气急败坏地问是谁干的，母亲告诉我是她行刑的，还说当时谁敢私藏林彪？当母亲听说这张邮票今天的价格时，也后悔不迭。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一篇纵论书画市场行情的文章，该文说现在坏蛋的字画行情猛涨，比如超级汉奸汪精卫的书法真迹值多少多少



**PIPILU
OPIRE**

词，乙方还遵守合同永不磨损，物以不稀为不贵，价格绝对上不去。我将来是沾不上你什么光了。”郑亚旗说。

第一 邀请书法家题写刊名



第一次安装电话

局交齐安装费后往往要翘首以待半年甚至1年才能装上电话。当时住宅电话是紧俏商品，绝对的卖方市场。

1985 年底，写作渐入佳境的我愈发感到时间不够用。当时《童话大王》创刊不久，我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到日子不交稿就得跳楼的期刊写作方式，心理压力颇大，写作时最怕听到敲门声。那时或编辑或作家或朋友有事找我，因大家都没有住宅电话，人家直接骑自行车就来了，当时门镜这种伟大的发明尚未进入百姓家，何况就算有，你能残忍无情到不开门？那时的来访者十有八九属于不速之客。我正在写作时，突然来了客人，少说也得陪着聊上半个小时。人家兴致勃勃地告辞了，我却在之后的 3 个小时内心猿意马收不拢心。记得一天下午我在家写一篇名叫《老虎药店》的童话，是 1986 年第 1 期《童话大王》中的一个短篇，那期《童话大王》的稿子就差这一篇了，我必须在次日交稿。当我刚写了一行时，有人敲门。下面的事我不说你也能猜出来，那朋友一直呆到吃完晚饭才凯旋，而没有熬夜习惯的我愣是通宵未睡一直把太阳写出来。

我梦寐以求家中有一部电话。如果有了电话，起码能节省我 70% 的时间。很多在电话上



当一本期刊的唯一撰稿人实在应该安一部电话，大家有事找你打个电话就行了，不必登门占用你的时间。我说我申请了，安不上。

客人走后，一位叫刘静的女孩儿问我：

“郑叔叔，你想安电话？”

“想。”我叹了口气，“写到一半时，来客人了，我就写不成了。可现在安电话太难了。”

“我让我爸爸给你安电话。”刘静说。

“你爸爸？”我看她。

“刘静的爸爸是咱们这儿电话局安装班的班长。”一位叫王钰的女孩儿告诉我。

我没有当真，因为她们毕竟是 10 岁左右的孩子，我的小读者，童言无忌。

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刘静把她爸爸带到我家来了。刘先生对我说他女儿爱看我的书，刘静昨天回家给他下了必须给郑渊洁安电话的命令。我有点儿不知所措，我头一次感受到读者的“威力”。我对刘先生说现在安电话太难，孩子的话不必当真。刘先生说这个地区的电话局为了缓解电话紧张状况，暂时设立了一个总机，用安分机的方法可以多安装一些电话，他说先给我安一部这样的分机电话以解燃眉之急，估计1年后就可以“转正”改为直线电话。

第一决 安装电话



第一 次 安 装 电 话

尽。我告诉那朋友，我从来没这样送钱给别人过，我向他请教该送多少，怎么送？朋友说100元就行，当面给双方都难堪，可以夹在一本我写的书里。

当天晚上，我将 100 元钱夹在我的一本书中，我当时的感觉是亵渎了我的书，不管怎么说，我认定这是行贿。但我实在是太需要电话了，我不得不为此铤而走险。我先打电话给刘先生，说我想去他家送他一本书表示感谢，刘先生说很荣幸并告诉我住址。我带着书去了他家。一番寒暄后，我留下书告辞了。说得好听是告辞，其实是夺路而逃。刘先生家住 6 层，当我下到 2 层时，刘先生追下来了，他拿着那 100 元对我说，郑先生您这是干什么？您这是骂我！我女儿喜欢看您写的书，我能为您做点儿事觉得很荣幸，您把钱拿回去。

我当时拿着那 100 元贿金真想找个地缝儿钻进去，我无地自容，用今天的话说，像犯罪嫌疑人。

次日我找到教唆我的朋友臭骂了他一顿，他嘀咕说怎么可能肯定是嫌少要不你再多送点儿试试，我说去你妈的。

这是我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行贿，以惨败告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那以后，



PIPILU
皮皮魯

最好拿出凭据来。我们翻箱倒柜，由于是数月前的单据，一时没有找到。于是我的电话就这么一直被停机。由于此“飞来横祸”的干扰，那期的稿子晚交稿3天。最后经过我们掘地3尺抄家般的搜索，终于找到了那张交款凭据。我雄赳赳气昂昂地拿着它到长话局给她们看，人家说原来交过了那就恢复通话吧，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我就纳闷她们收费怎么就没有底联呢？

同年的又一个月，我去电话局交市内通话费，面对电脑打出的比往常陡增 10 倍的通话费，我向营业员表示质疑并要求看明细帐单，营业员说看明细通话单得去位于东单的电话局营业室，她说你最好先交了这个月的话费再去查，因为查话费不是一两天的事，如果你不交话费，我们就会掐你的电话线。我说要是你们让我交多少我就交多少等日本鬼子再侵略中国时我肯定是汉奸。我当即驱车去 10 公里以外的东单电话局营业室，那营业室门口的袖珍停车场堪称世界之最，半个小时后我才等到车位。营业室的所有窗口都排长队，一个小时后才轮到我，我说明来意。营业员给我一张表，让我填写，我填完表又重新排队。又一个小时后，营业员接过我的表格告诉我回去等查询结果。

第一次安装电话



PILU
皮皮鲁

电话时，会首先听到这样一段话：“您好。为了保证我们的服务质量，您和本公司工作人员的这次通话将被录音。”在美国，电话公司之间的竞争可以说是你死我活，靠什么竞争？当然是价格和服务质量。

垄断经营是中国大陆电信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以至于电话用户怨声载道的根源，没有竞争机制的领域肯定是死水一潭臭气熏天。过去铁路号称“铁老大”，没人和它竞争，服务差、晚点和买票难成为铁路的同义词。随着公路运输和航空运输的飞速发展，铁路的变化有目共睹。按说铁路从业人员的素质和电信从业人员的素质应该是半斤八两强不到哪儿去，怎么铁路的面貌就骤然间焕然一新了呢？这是竞争的结果。银行的服务也大有改观，现在银行多了去，你的服务差，对不起，我去另一家存钱。是竞争导致银行改进了服务。按说连银行这么重要的领域国家都允许其引进竞争机制，怎么国家就眼睁睁看着电信领域一枝独“锈”垄断经营而熟视无睹呢？

美国微软公司如今可以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级公司，该公司为美国创造了无数就业机会和增加了天文数字的税收，用我们的话来说，算是为国争光了。可就是这样一个劳苦功



PIPI LU
皮皮鲁

荣。经济不景气的原因是购买力走低，倘若收入不变，价格却提高，购买力只能更低，经济因此更不景气，从而进入恶性循环。1961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西屋公司偷偷摸摸联手制定“行业自律价格”，企图垄断维持高价，结果被明察秋毫的司法部起诉，几位经理为此还坐了大牢。质量、服务、价格，企业之间靠这3个东西竞争，受益的能不是消费者？消费者欢天喜地的花钱了，经济能不增长？

从我的第一次安装电话竟然说到了美国司法部，可谓离题万里。希望我们的电信领域早日引进竞争机制。希望我们的每一位电话用户在交费的同时都能得到一份印制得赏心悦目的让人心悦诚服的话费明细帐单。据消费心理学家分析，电话用户在交费时即使电话局没有多收费，如果用户看不到明细通话帐单，95%的人都会有“怎么这么多”的错觉。倘若电话局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反正也没作弊没黑箱操作没多收费索性像美国电话公司那样将一目了然的话费单奉献给用户，双方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之所以不这样做，恐怕还是有难言之隐。

随着电话的普及，写信的人越来越少。对于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笔巨大的损失。当你老态龙钟的时候，看昔日的信能使你返老还童。而面



第一次钓鱼

第一次釣魚

我是一个不爱玩的人，自从 21 岁起选择了写作为生后，就更是远离各种娱乐活动。我不跳舞不去歌舞厅，不去夜总会，不打牌，不旅游，不爱参加聚会聚餐……。除了写作，我唯一的爱好是驾驶机动车。遗憾的是随着驾龄的增长，这个爱好也日渐淡漠，从能开就开演变到能不开就不开。

朋友们想方设法“勾引”我玩，他们近乎“绑架”我去过歌舞厅、夜总会、洗桑拿浴、打麻将和结伴旅游，但无一例外处女行都变成了绝唱，再没去过第二次。朋友们说我活得亏，我也觉得亏，可做不喜欢的事岂不更亏？

1994年7月初的一天，《皮皮鲁传》的责任编辑张翔来我家拿书稿，他见我从桌子旁边



PIPILU
皮皮屋

第一次釣魚

张翔说：

“现在是夏天，咱们得早点儿去。19号早晨7点我到你家楼下等你。”

1994年7月19日，我平生第一次钓鱼。清晨7点整，有良好的守时习惯的张翔准时出现在我家楼下。我和儿子郑亚旗会同张翔和其子张羽驱车到位于北京马家堡南边的一家钓鱼场钓鱼。

这家钓鱼场有十几座鱼池，我们选择了最靠西南角的一座鱼池。

张翔打开他的渔具包，里边钓鱼用具一应俱全。张翔教郑亚旗怎样将鱼钩、鱼漂、渔线和鱼饵拴在鱼杆上。我在一边看。

已然是钓鱼行家里手的张羽熟练地将他的渔具安置完毕，鱼饵坠入水中，只等鱼上钩。

张翔指导亚旗下钩后，又给我弄了一副鱼杆垂钓。张翔在一旁当教练。

“有了！”张翔对郑亚旗说。

亚旗起杆，一条大鱼的脊背浮出水面。鱼杆最上面那节被鱼的体重坠弯了，形成一道充满魅力的弧线。

“遛它一会儿。”张翔告诉郑亚旗，“钓鱼的人都喜欢这么遛鱼。”

郑亚旗站起来很有成就感地举着鱼杆遛水



PiPiLu
皮皮露

第一决钓鱼

取利益。我才知道请钓鱼已成为行贿的一种方式。当时我竟产生了“李局长”才是被钓住的一条鱼的幻觉。

第一次钓鱼后，我觉得我对钓鱼没什么兴趣，但我发现郑亚旗对钓鱼比较感兴趣，我就委托张翔帮我们购置了全套渔具。此后每年我都会陪儿子钓几次鱼。短篇《鱼爷》和《魔鬼垂钓》都是我在钓鱼时获得的灵感。

人生很像钓鱼，钓别人和被别人钓。“上钩”实在是一句含义极深的词汇。金钱、学历、汽车、美女、住宅等等都可能成为鱼饵，鱼饵后面是否藏有锋利的带倒刺的鱼钩，就看你的判断力了。纵观人生钓鱼场，最容易成为鱼被别人钓的，当属各级官员。

为了谋取利益而向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行贿，是一种典型的钓鱼。行贿者是垂钓人，鱼是官员。有幸身为官员的人，如果你在出任官员的第一天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众多垂钓者的猎物，没有小心翼翼地躲避鱼饵，等待你的只能是身败名裂甚至杀身之祸。

海南省有个东方市，该市由于既无旅游景点又无特产从而在广袤无垠的中国毫无知名度。1998年，东方市因了一次“钓鱼”事件一夜之间名噪全国，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广告效



应。东方市委书记名曰戚火贵，此公于 1993 年出任市委书记后由于智商低下，并未意识到自己事实上已经成为东方市最大的一条鱼。无数垂钓者准备了用金银财宝制作的鱼饵向他下钩，形成了成百上千名垂钓者同钓一条鱼的壮观场面。严格地说，戚火贵不是一条鱼，而是一对鱼。其妻符荣英身为中国银行东方支行行长，与其夫一起成为垂钓者的猎物。戚书记伉俪在东方市如鱼得水地畅游着，他们被那么多香喷喷的鱼饵弄得垂涎欲滴，于是一口口吞过去，5 年间，戚火贵夫妇共受贿 1300 万元人民币！咬上如此多的鱼钩，没有不死的道理。1998 年 11 月 4 日，海南省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戚火贵书记死刑，判处符荣英行长有期徒刑 16 年。当我从媒体上看到符行长在法庭上听到宣判后当即昏厥的照片时，我立即想起了在垂钓园里那些因贪吃而上钩的鱼，它们口流鲜血在地上残酷地挣扎，浑身沾满尘土，大口大口地喘气。

广西玉林市最大的鱼也没能把握住自己，上了垂钓者的钩。玉林市委书记叫李乘龙，1991年至1996年间，李书记涉嫌受贿金额1000多万元，直吃得脑满肠肥丢了身家性命。



PIPILU
皮皮屋

第一决钓鱼

咬钩的鱼，共吞“鱼饵”17万元人民币。1998年11月27日，姜副主任被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河南省灵宝市地税局副局长、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卫建设在灵宝市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条不大不小的中鱼，向他下钩的垂钓者居然也不少。1994年12月至1998年4月，卫副局长共咬钩62次，受贿160余万元。卫副局长另有300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肯定也是吞下的鱼饵。1998年12月13日，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财政部副部长别格马托夫、生态部副部长阿克涅耶夫和工业部副部长阿萨纳利耶夫因受贿被逮捕。美国总统克林顿这条堪称世界上最大的鱼克制住自己没有咬金钱鱼饵，但他一不留神咬了美女鱼饵，上了莱温斯基小姐的钩。无异于赤条条将自己展示在全人类面前，丢人丢大发了。由此可见整个地球是一座垂钓园。

行贿的垂钓者的行为也触犯了刑律，但鲜见有因此而被处死的。受贿的鱼被送上断头台的却举目皆是屡见不鲜。这看似不公平，实为地球上少见的公平。倘若所有的鱼都不咬钩，垂钓者的行贿行为并不能对社会构成危害。谁让你咬钩的？



PIPILO
皮皮龍

第一次吃人肉

令人毛骨悚然的题目。郑渊洁真的吃过人肉？怎么会？

这是真事，我确实吃过一次人肉。

1975年11月，尚在服兵役的我因病住进部队的276医院。年轻军人住院，很容易和护士保持融洽的关系，表现这种关系的文学作品挺多，比如海明威。我也没能免俗，和护士们保持了令人满意的关系。护士们对我照顾有加。

一天，一位护士很神秘地跑进我的病房。

“郑渊洁，我给你找了一种大补的东西，你敢吃吗？”她小声问我。

“什么东西？”我问。

“胎盘，这东西特有营养。”

“胎盘？”

第一晚吃人肉



第一次吃人肉

肉。

吃了胎盘后，我确实有身强力壮的感觉，但我揣摩那是精神作用，就像今天的人吃甲鱼一样。探寻长生不老和健身的办法是人类孜孜不倦的追求，从秦始皇炼丹到如今满视野的保健食品保健药品保健器械，都是同一个目的。其实，最有利于健康的是好心情。

吃了那个胎盘后，我的内心深处总有挥之不去的对胎盘主人的负疚感。时至今日，我还会胡思乱想那个今天应该是 24 岁的婴儿现在何处，也可能我们在大街上曾经擦肩而过。如果我对街上的一个陌生人说，我在 24 年前吃了你的胎盘，会出现什么情景？

我看过一部外国电影，名字叫《天劫余生》，是根据真事拍摄的。1972年10月13日，一架载有45名乘客（大都是运动员）的飞机坠毁在安第斯山脉，其中12人当场死亡。24小时后，又有4人冻死。10月21日，当局放弃搜索。10月23日，活着的29人断粮。万般无奈下，他们选择了食用死去的同胞的肉延续生命。数日后，在断定无人会来营救他们后，两个人带上足够的人肉，走出了冰天雪地的安第斯山脉，带回了营救的直升机……

在万不得已下，为了生存，人是会吃先于



第一块吃人肉

一位摇钱树作家自然不会被中国大陆出版界视而不见，于是竞相购买他的版权。奇怪的是斯蒂芬·金的最优秀的恐怖小说被翻译到中国大陆后，竟然无人问津倍受冷落，弄得我们的张开了钱袋准备发财的出版社捶胸顿足百思不得其解。我翻阅了斯蒂芬·金的几本恐怖小说，我的感觉是一点儿也不恐怖。比如作品中的主人公的手断了，这也许吓得美国读者心惊肉跳，而对于“文革”中司空见惯批斗人致死再吃其肉的中国读者来说，就太小儿科了。恐怖小说不恐怖，自然无法吊读者的胃口。其实，中国人写恐怖小说最有生活素材。恐怖小说大王的桂冠错戴在了美国作家头上，上帝瞎了眼。

还有一种吃人肉不是直接吃，而是间接吃。公款吃喝表面看吃的是鸡鸭鱼肉，实质上吃的却是人肉。中国大陆尚有数千万人生活在衣食不保的绝对贫困线之下，倘若将每年公款吃喝的数百亿元人民币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早就脱贫了。公款吃喝吃的都是人肉喝的全是人血。

国外也有间接吃人肉的，美国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申办行贿丑闻说明国际奥委会吃了美国纳税人的人肉。盐湖城冬奥会申办委员会甚至



PIPILO
皮皮魯

第一次买进口钢笔

在个人电脑尚未问世的年代，用母语写作的中国作家鲜有使用打字机的，他们大都使用钢笔。笔耕是对中国作家写作的形象描绘。我自1977年初开始写作，使用的是国产的英雄牌钢笔。英雄钢笔在当时的中国大陆钢笔领域堪称贵族，价格不菲，我记得我的第一枝英雄钢笔是花5元钱买的。5元在1977年对我来说属于巨款。能在一枝钢笔上投资如此款项，可见我对写作的钟情。

钢笔的质量与写作的质量没有正比关系，但写到兴头上钢笔突然不出水了毕竟是令人扫兴的事，有时还会影响思路，特别是墨水瓶不在手边时。写作时间长了，对于钢笔里的墨水什么时候弹尽粮绝，心中大致有数。记得有一

第一次买进口钢笔



“北京友谊商店。”

“什么时间买的？”

“一个小时前。”

“您能带着这枝笔再去一次友谊商店吗？”

“干什么？”

“我们给您换一枝。”

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再跑一趟。

从樊小姐给我的名片上，我得知她是派克笔驻京代表。她接过没有笔囊的世纪笔反复看，还说这样的事是头一次遇到。她给我换了一枝有吸水装置的世纪笔，并代表派克公司向我致歉。樊代表告诉我，她要将这枝笔转送到公司总部。

这次离奇的经历给刚刚准备在追求名牌的道路上起步的我敲响了警钟，我由此悟出一个道理：再著名的名牌也会有质量问题。后来我将这句话写进了《奔腾验钞机》。

我使用派克世纪笔写的第一篇作品是《大灰狼画报》的连载专栏《大灰狼罗克》连环画第60集。这枝派克世纪笔为我的写作服务的时间很短。1995年，我改用电脑写作。世纪笔没能伴随我的写作跨世纪，由此可见人类科技发展的速度。

第一次买进口钢笔



第一次买进口钢笔

砸了自己的牌子。曾经显赫一时在全球拥有 68 家大型超级市场的日本八佰伴公司在 1997 年 9 月 18 日宣布破产，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国外事业发展过快。在韩国的大街上几乎看不到进口汽车，全是清一色的国产汽车。据说有一位老板乘坐一辆进口汽车上班，在停车场被愤怒的工人砸了。韩国人有双重原则，他们不进口别人的汽车，却出口自己的汽车。一切从本民族的利益出发。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话又说回来，尽管如此，谢绝进口车的韩国仍未逃脱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魔掌。

不管怎么说，如果质量不相上下，作为本国消费者，我认为应该买国货。

买东西确实有一个运气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得承认，我的运气欠佳。如今我对购物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信，现在发展到我看好一件商品后，先离开商场，再让家人去付款购买。

今天，钢笔已经完全从我的生活中消失。随着动笔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提笔忘字的现象越来越多。有一次我到北京皮皮鲁专营店，一位读者认出了我，她请我在她购买的《郑渊洁童话全集》上签名，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告诉我后，其中的一个常用字我死活想不起来怎么写。以至于她说你真的是郑渊洁？科学技术造就了不会写字的作家。生活本身就是童话。



“天上往下掉馅饼”性质。

1970年12月，15岁的我开始服兵役，按中国现行人事制度的规定，这就算“参加工作”了。于是，我的“工龄”从1970年12月开始计算。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大都有两种年龄，一种是生理年龄，也就是岁数。另一种是工作年龄，也就是通常说的“工龄”。1976年4月，服兵役期满的我复员回原籍北京，在一家工厂当工人。由军人转换角色为工人，严格说，不算调动工作，而属于“服从组织分配”。

过去，在中国的城市，“参加工作”的人的身份被分为两种，一种是干部，另一种是工人。不论怎么说“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事实上，干部身份比工人身份要高人一等。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之间显然有一道难以逾越的沟壑。一些工人不甘心终生当工人，他们努力往“干部”阶层奋斗。当时的工人若想改变身份，最佳途径是考大学。其次是先获得“以工代干”的资格，以工人身份做干部的工作，而后再伺机转干，以至于产生了“以工代干”这一奇特的现象和称谓。再有就是一部分喜欢文学的工人通过发表作品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以此为敲门砖调往编辑部。

第一次调动工作

[illegible]

1980年，发表作品已有3年历史的我从未动过摆脱工人身份调往编辑部当编辑的念头，这可能与我所处的环境颇有利于创作有关。我在工厂的工作是开水泵，我看管的水泵有两个任务：给中央空调设备供冷却水和全厂生产生活用水。我的全部工作量是上班时按一下电钮，下班时再按一下，除此之外只需一个人坐在工作室呆着，别无他事。工作室里有一张桌子，一个用来放书的柜子，一部电话。这对于写作的人来说，无异于天堂了。在这间被郁郁葱葱的树木环绕的小房子里，我开始了我的文学生涯。有的工人师傅虽然对我上班写作有非议，说应该算“干私活”，但车间主任却旗帜鲜明地支持我。有“组织”为我撑腰，于是我就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地在上班时间写作。

有如此优越的写作环境，我自然不会产生调动工作的想法。

1980年7月15日，我在水泵房接到《儿童文学》编辑部的编辑由岑的电话。由岑说《儿童文学》改月刊后编辑部感到人手不够，她问我有没有过离开工厂当编辑的想法。我说目前还没有。由岑说这是一个机会，她让我考虑，还说如果同意，就去杂志社和编辑部主任谈谈。



第一、决定调动工作

处事很少拖泥带水的我竟然考虑了一个多月，我主要是担心当了编辑整天编别人的稿子，自己写作的时间可能就少了。但必须承认，“编辑”这一职业当时对我来说还是有诱惑力的，何况又是人家找上门来的。

8月的一天，我同编辑部主任马振见了面。我向马振表示，我可以试试。也许干一段时间后，你们不要我了。也可能我不愿意在你们这儿干了。马振说先借调3个月吧，工资还由你的工厂出。我们就这么谈定了。

车间主任曲海山为我借调到杂志社大开绿灯，在我借调期间，工厂照常发给我全额工资。1980年9月2日，我到《儿童文学》编辑部上班，协助童话编辑刘庭华编童话。转眼3个月就过去了。3个月的编辑生活，我觉得视野比在工厂时要开阔，我就向马振表示愿意正式调来当编辑。马振说他去出版社跑这件事。

《儿童文学》编辑部没有人事权，调人须经出版社同意。

不知不觉快一年了，我的正式调动仍未办成。这期间我从未到出版社找领导“跑”过调动，这是我的“我自乾坤大，万事不求人”的性格决定的。我只是问过几次马振，老马总是叹气。一年中，我虽然和编辑部的同事相处融



PIPILU
皮皮里

第一次调动工作

有“学历”的工人挺满意，他最后叮嘱我“好好干”。整个谈话时间没超过半个小时。交谈结束时，陈模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要调就正式调，不能借调。陈模当即从他的办公室对面的房间叫来文联人事处长陈冶，陈模对陈冶说，你尽快给郑渊洁办调动手续。

全部调动手续在几天内即办妥。我的“人事关系”随“档案”由工厂到了市文联。1981年9月26日，我到北京市文联正式上班。此即为我的第一次调动工作。

在中国大陆，非农业户口的成年人都有档案。改革之前，人员的流动受到档案的限制，人的使用亦受到档案的制约。改革开放以来，人才流动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人事制度和档案制度已经越来越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几张纸几个章就能决定人的命运确实只能是在童话里才应该发生的事。内蒙古自治区有个叫郭爱宏的人，此公既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干部，1995年，郭爱宏伪造了全套档案，他竟然凭假档案到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市当了两年市委副书记！

如今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不在乎“档案”。我估计再过若干年，“人事关系”、“档案”、“工龄”这些词会像“粮票”、“工业券”、



鄭淵浩隨筆

“布票”一样成为古董词汇。

说到我的第一次调动工作，不能不说陈模。我和陈模素不相识，经人推荐后只见了一面，陈模在认定我是“人才”后，就用其手中的权力将我的“档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工厂调到文联。时至今日，我想起这件事时，还会万分感慨。每每因从媒介上看到贪官污吏此起彼伏的丑行而对社会丧失信心时，我就想生活中毕竟还有陈模这样的官员。1957年，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的陈模被打成右派，从此接受劳动改造近20年，历尽人间苦难。1979年2月，在北京西苑饭店的一次会议上，胡耀邦在主席台上看到了坐在会场里的陈模，他指着陈模对参加会的人说：“在共青团的高级干部中，谁吃的苦头最多？就是陈模！团中央在1957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好同志，其中就有陈模，他受委屈了。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当时我是共青团第一书记。我现在向陈模道歉！”胡耀邦当着所有与会者的面向陈模鞠了3个躬。胡耀邦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

陈模离休十几年来，每个春节我都去看他，从无间断。我管这叫感受光明。生活中的阴暗毕竟太多了，一年到头，人总得找个机会透透气。



第一次出生

我第一次出生的时间是公元 1955 年 6 月 15 日 1 点 55 分，地点是中国石家庄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带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两个人，一个是我父亲郑洪升，一个是我母亲刘效坤。当时我父亲 23 岁，母亲 22 岁。

我至今不能十分肯定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出生，我自小到大经常听到人们说“他上辈子准积德了”或“她上辈子准没干好事”之类的话。鉴于存在决定意识，人类的语言八成也不会空穴来风。如果人真有上辈子，我对上辈子的事确实一点儿印象没有。因此，我权且将本次生命暂定为我的第一次出生。倘若日后科学发达到能真实测出每个人的“上辈子”，我再重写《我的第一次出生》。现在别把话说绝。

第一夜出生



PIPILU
皮皮魯

第一次出生

道那对于我的母亲来说不亚于一次灾难，不然民间不会有“生日是母难日”之说。作为普天下的母亲，向世界推出一个生命实属不易，尤其是最后的力荐关头。时至今日，已经 40 多岁的我，每年过生日都要和母亲在一起。

在孩子生日那天见到孩子，是母亲最基本的权利。不管那孩子长到多大。

我对于我“投胎”降生的这个家庭很满意，我从小到大明白无误地感受到父母对我的爱，他们从未打骂过我，他们给我营造了自由宽松民主的成长环境。我对他们最感激的，是他们没有逼我上大学，无论是工农兵学员时期还是恢复高考后，使我得以在没有压力的状态下不受束缚地构筑人生的大厦。我和弟弟妹妹融洽相处，真诚地相互帮助，共享手足情。还有妻子和孩子，都是上帝对我的慷慨赐予。我常常思考充满神秘的生命，我可以肯定人类目前对于自身的认识是肤浅的。我不知道人死后是否会轮回转世。前些年我从媒体上得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逝世后，国务院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协助寻找他的转世灵童，这说明人死后是会转世再生的。我经常听别人说这样的话：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将如何如何如何。



PIILU
皮皮屋

第一次参加抗洪

1974年7月上旬，江西省连降暴雨，造成鄱阳湖水位上涨，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地方政府向部队求援。驻扎在南昌县的空军航空兵14师派遣250名军人赴鄱阳湖参加抗洪抢险。19岁的我是其中的一员。

1974年7月19日上午，我服兵役所在的空军航空兵13机动机务大队4中队正在进行批林批孔运动第五专题的学习。所谓第五专题，是批判孔老二的中庸之道。孔老是当时媒体上对孔子的蔑称，好像因为孔子在他家是第二个出生的孩子。“老二”在中国民间俗语中有男性生殖器的意思。和媒体上公开称呼孔子为“孔老二”相比，今天北京足球场上山呼海啸般的“傻B”实在应该算是文明的了。正当我和

第一次参加抗联



史》，一本《毛泽东选集》。另外再加上这本日记。

计划改变了，明天出发。

晚饭后同亚洲到建军、小何处告别，说不定就永别了，关键时刻要敢于牺牲。

指导员在做抗洪动员时再三说抗洪是很危险的事，要敢于牺牲。我没给父母写信，怕家人担心，但写了遗书，留在军营。

次日早餐后，我们打起背包，乘军用卡车离开向塘机场。行前每人发了面包和煮鸡蛋。由于车上人多，加之路面质量欠佳，我们的身体在车上难免相互碰撞。随着一次刹车，有人高喊：“别挤碎了我的鸡蛋。”我说：“人的蛋都快保不住了，还管什么鸡的蛋。”大家笑。指导员瞪我。

汽车经过南昌市，我们在八一大桥下车，乘船沿赣江赴鄱阳湖。赣江水位很高。下午4点，我们到达鄱阳湖蒋巷公社玉丰农场。我们站在大堤上，堤外是一望无际的鄱阳湖，堤内是农田和房屋，鄱阳湖的水位比堤内高出很多。一旦决堤，后果不堪设想。1998年夏季，



第一次参加抗洪

水，解放军来了，水就退了。去年发水，解放军没来，就溃了堤。今年水位一上涨，老百姓就坚决要求解放军来，说是解放军一来，就会平安无事。

我们住在一所小学里，9平方米的房子睡了15个人。由于蚊子很多，每人还得挂蚊帐。睡觉时需保持中庸之道，否则身体只要挨着蚊帐，就会遭到蚊子隔着蚊帐的袭击。南昌地区是中国有名的四大火炉之一，夏天酷热难当。我们这么多人挤在这么小的空间里，其热度可以想像。这里没有自来水，生活和食用水都是鄱阳湖的湖水。湖水喝起来有股苦味儿。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一直有“拧开水龙头就有水哗哗流出来绝对是一件幸福的事”的感触。奇怪的是这感触25年挥之不去，包括住5星级饭店时也会这么想。

第二天，也就是1974年7月21日，我们加固几处出现险情的大堤。加固的方法是将大石头抬到大堤上压住稻草，一天下来，肩膀都肿了。

再转录我在 1974 年 7 月 22 日写的日记：



为“稍微”)宽畅(错别字,应为“宽敞”)一些。

今天晚上更热了，在屋内已无法入睡，生平第一次在外面“露营”，睡在二楼的平台上，睁眼是满天星斗，耳边是潺潺流水，风景这边独好，只是温度太高了。半夜起了大风，蚊帐像旗子一样飘起来。用闪电般的速度搬回了屋里，凉快了。抗洪以来第一个好觉。美梦连绵不绝……

1974年7月23日下午，蒋巷公社党委书记、公社秘书、玉丰农场主任、生产队长和一个老贫农给我们上了一课。公社书记告诉我们，玉丰农场在15年前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芦苇荡，芦苇有两三人高，血吸虫繁多。1959年，贫下中农响应毛主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号召，围湖造田，在原本是湖水的地方愣是垦出了4000亩稻田，1972年年产水稻450万斤。我记得当时我们很被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1998 年夏季，我从媒体上获悉，鄱阳湖又被洪水困扰，据说，是 1949 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水灾。据专家分析，此次鄱阳湖水灾除了受长

第一次参加抗联



江持续 50 多天的超历史最高水位的影响外，与鄱阳湖面积逐年缩小有很大关系。鄱阳湖面积缩小有三个原因：一是围湖造田。二是河床因堆积作用逐渐抬高。三是长江大汛时大量泥沙倒灌入湖。而其中围湖造田导致鄱阳湖面积减少最为至关重要。这就是说，围湖造田导致鄱阳湖水灾频繁发生。

人类如果通过改变自然环境求生存，其结果很可能是灾难。这样的课，不是公社书记能讲的，得由老天爷亲自给人类上课。

1974年7月29日，我们结束抗洪，于深夜2点30分出发离开鄱阳湖返回部队，贫下中农放鞭炮欢送我们。

回到向塘机场总结抗洪后，我受到了嘉奖。这是我服兵役5年受到的唯一一次嘉奖。

1974 年参加抗洪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那次听公社书记等 5 人给我们上课。最后一个讲话的是一位老贫农，他先是忆苦思甜，最后联系批林批孔。他是这样结束他的发言的：

“什么孔孟知（之）道！有什么了不起？孔孟知（之）道的，我们贫下中农也知道！”我们先是一愣，当我们反应过来贫下中农将“孔孟之道”误以为是“孔孟知道”后，谁也不敢笑。在那个年代，嘲笑贫下中农是会倒楣的。

比围湖造田危害更大的，是围人造田。



PIPILO
皮皮羅

第一次被盜

第一次被盜

《现代汉语词典》给盗窃下的定义是：用不合法的手段秘密地取得。由此推论，被盗就是：被他人用不合法的手段秘密地取得原本属于你的财物。

我的第一次被盗发生在 1968 年夏天。

我的小学时代是在位于北京北太平庄的一座部队宿舍大院度过的。该大院里混居着3个单位的军官和他们的家属：总政、国防科委和军事法院。大院的东侧是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的宿舍。南侧是铁道干校的宿舍。西边是北京电影洗印厂。北边紧靠今天的北三环西路，当时好像叫学院东路。

大院里共有 5 座楼房，未成年人的社交活动范围大都划地为牢以楼界定。我住在 7 号



楼，结交的自然大部分是7号楼的未成年人。那是一个喜欢结伙的年龄，不管做什么，都搭帮结伙。上学一起走，放学一起回家，玩起来更是呈现乌合之众态势。

1968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第3年，当时北京的青少年群体中最时髦的服装是军装，美其名曰国防绿。最流行的鞋叫回力鞋。所谓回力鞋其实就是球鞋，鞋的内侧中间靠近鞋底部位有个红色的半球形标志。还有一个时髦的标志是将自行车的后架子拆掉。在1968年，最酷最狂的北京青少年特征如下：穿一身国防绿军装，如果上衣里边套一件有垫肩的呢子军装就更帅了。头戴里边塞了报纸将帽沿上方撑成大沿帽形状的军帽。脚踩回力鞋。骑一辆卸了后架子的锰钢自行车。车把上斜插一把弹簧锁。车座提升到极限位置，从后边远远看去，很像骑车人的肛门下边插着一把日本军刀。

在今天的孩子看来，这身行头无异于小丑。可在30年前，确实风光无限。由此可见，时间能将最时髦的东西变成最丑陋可笑的东西。

由于并非所有未成年人的爸爸都是军人，加之军装在商店里没有销售，因此当年一些懂



憬时髦的未成年人就将获得军装作为自己的理想，正路搞不到，只能盗窃或抢劫。

我的父亲是军人，我自然有幸在那个年代享受到穿名牌带给我的满足感，由此我也成为盗窃和抢劫名牌服装的人的目标。

那时的孩子的娱乐活动项目比今天的孩子少得多，游泳是夏季的首选娱乐项目。我居住的大院没有游泳池，我们游泳要去黄寺的总政大院。从我们大院步行到黄寺约需 40 分钟。一般我们都是以楼为单位成群结队去游泳。我记得到黄寺游泳要办一张游泳证。如果想去游泳池的深水区游泳，还需经过“考试”，由游泳池管理人员在游泳证上加盖一个“合格”章。

一天中午，我和 7 号楼的一帮未成年人结伴步行去黄寺游泳。黄寺游泳池的更衣室是露天的，没有存放衣物的柜子，我们就将衣服塞进尼龙兜里挂在游泳池边的铁网子上。那天我想创造一个自己的游泳长度纪录。在此之前，我不间断游得最长的纪录是 200 米，而同楼的同龄人经常夸耀自己能游 1000 米。

那游泳池的长度是 50 米。我开始向自己的“世界纪录”挑战。当破了纪录后游到 300 米时，我感到很累，我就迫使自己想别的事，分散注意力。后来我发现，有时注意力集中是好



装，家中没有军人的未成年人没有军装，商店又没有卖的，有钱都买不到的东西，而他又往死里喜欢，他似乎只有盗窃和抢劫一条路可走，如果他非穿不可的话。同样，如果政府不使出浑身解数有效地为老百姓创造就业机会，老百姓如何去挣钱养家糊口呢？家中没有“军人”，又买不到“军装”，他们还想穿，可供他们选择的路就不那么多了。

说到我的第一次被盗，似乎还应该说说赶时髦。赶时髦是一种从众心理，别人怎么样，我就得怎么样。其实，随波逐流是妨碍人生成功的大敌。独树一帜的求异心理才是成功之母。潮流、时髦、流行是客观存在的人文现象，自有其道理。拥有从众心理的人努力将自己融入其中，生怕落伍。而对于具备求异心理的人来说，这却是独辟蹊径的好机会。没有万众一心的步调一致，怎能衬托出你的异军突起？和别人不一样是事半功倍的人生诀窍。

如今北京的男孩子大都喜欢将头发留得长一点儿，很少见到留光头的。我告诉我的儿子郑亚旗说，你独辟蹊径的机会来了。如果你亦步亦趋随大流，就糟蹋了你爹你娘送给你的头发。都留一样的发型，谁会注意你的头发？因此至今郑亚旗是光头。我不能说他在北京的男



第一次当兵

第一次当兵

如今世界上没有军队的国家不多。没有军队可能就没有和平，有了军队可能就有了战争。有的国家甚至将公民必须服兵役纳入法律，美国第42届总统克林顿就因为曾经逃避服兵役而在竞选总统时几乎被对手置于死地。而在1970年的中国大陆，根本听不到“服兵役”这个带有强制性质的词汇，那时服兵役有两个响当当的词汇：当兵或参军。这是由于当时的城市青少年够了岁数后必须将户口迁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标准称谓是“上山下乡”或“插队”。相对于连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的插队，当兵就成了令所有青少年青睐的最佳出路，不亚于今天的上大学。

1970年，我随父母生活在河南省遂平县的



国防科委五七干校。其时我 15 岁。当年 12 月，干校说，15 岁左右的子女都可以当兵，于是，我就和同龄人一起当兵了。15 岁属于未成年人，服兵役颇有“童工”的嫌疑，但在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中，15 岁甚至 13、14 岁的军队子女近水楼台先得月当兵的大有人在，其实质是逃避去农村插队，用今天的话说，应该算是一种腐败。

1970年12月下旬，我们这些身穿没有领章帽徽的新军装的新兵乘坐封闭式货物列车（俗称闷罐）赴部队。火车到江西省上饶市，我们下车在一所中学里住了一夜，次日乘卡车翻越崇山峻岭抵达福建省崇安县一座军用机场。如今崇安县已改名为武夷山市。我服兵役的部队属于“福空”，福空是福州军区空军的简称。一个月的新兵连生活基本上是给我们扫盲，扫军事盲。打枪，扔手榴弹，紧急集合，夜间站岗。我还记得我在新兵连第一次打枪的成绩，3发子弹打了28环。第一次扔真手榴弹的拉环被我保存到今天。当时我很担心扔出去的手榴弹会被套在我的小拇指上的拉环拽回来。在我的5年当兵生涯中，除了1个月的新兵连外，几乎没摸过枪。我的工作是维修歼击机。在新兵连时，连长经常告诉我们，能当地勤是很幸运



PIPI LU
皮皮魯

第一 決 出 兵

的，地勤在空军的地位仅次于空勤。所谓空勤，就是飞行员。飞行员吃空勤灶，每天3元的伙食标准。地勤吃地勤灶，每天1元。机场的其他人员和陆军吃一样的饭，每天4角8分。新兵连长常吓唬我们：“谁不好好干就调你们去扫跑道！”



事，是政治坠机。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获悉林彪倒台的情景。那是1971年秋冬之交的某日上午，我们被集中到向塘机场丁坊礼堂，师长亲自宣读中央文件，事先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师长的声音低沉沙哑，我记得开头几句话是这样的：

“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当时整个大礼堂鸦雀无声，军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师长念到“9月13日”时，不知为什么停顿了数秒，我立刻以为林副主席病世了。当我听到“仓皇出逃”时，呆若木鸡，惊讶到了极致。从那以后，我明白了两个道理：一个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另一个道理是凡是提前数年钦定的接班人，最终能接班的不多。

由于空军司令吴法宪是林彪死党，再加上林立果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空军理所当然成为严加防范的对象。陆军在林彪事件后进驻我们机场，所有飞机都由荷枪实弹的陆军老大哥把守。直到党对空军100个放心后，机场的陆军才撤离。我不知道同一个国家的军队的不同军种之间的“同室操戈”现象是否出现过，反正当时我们这些空军在持枪的陆军监视下维修



飞机，很别扭。明显的不被信任。

自从经历了林彪事件后，我对什么事都不会惊讶了。被全国人民天天虔诚地敬祝其身体永远健康的党章法定的接班人林副主席一夜之间成了过街老鼠林贼，我今天之所以能写童话，和经历过如此奇特的极富童话色彩的事不无关系。

1976年3月，我结束了5年的当兵生涯，退役。时年21岁。部队发给我160元复员费。我维修过的歼击机至少有20架，如今不知它们在哪里。

如果我没有当过兵，如果我没有当过空军地勤，舒克开飞机的可能性不大。

鄭淵浩隨筆



.....

第一次写舒克

第一次写舒克

1949年至1978年，中国大陆崇尚阶级斗争，连童话也不能幸免。童话中的动物都被赋予了阶级成份，比如羊、兔、鹿、象等是好人，而狼、狐狸、老鼠等则是坏人。我从小是看这种图解政治的童话长大的，自然痛恨坏人。那时的所谓坏人就是地、富、反、坏、右。当我在15岁时得知自己的爷爷是富农时，“我怎么会是坏人的孙子”这种恶念很是折磨了我一些年。

1982年9月，已经写了4年童话的我不愿意再按老套路写了，想“突破”一下。我于是谋划用自己的笔给童话中的“坏人”平反，我首选了老鼠。当时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卡通节目尚未敲开中国的



PIPILO
皮皮魯

第一次写舒克

很顺利，有时候却步履艰难。我发现如果在作品中有一个自己很熟悉的“道具”，往往会导致写得顺利。没有哪个作家喜欢在写作时“难产”，那滋味很折磨人。为了让自己能早点儿睡觉，我给舒克配备了一架飞机。我当过5年空军地勤，我想发挥这个优势。

我的给富农当孙子的经历再加上熟悉飞机，那次写作可以说是一气呵成。舒克这只心地善良的小老鼠，由于出生在老鼠家庭而受到别人的歧视，舒克不甘心过这样的生活，他驾驶直升机离家尝试改变自己的命运……

凌晨3点，我给这篇名为《开直升飞机的小老鼠》的短篇童话画上了句号。舒克诞生了。他的准确生日是1982年9月13日，出生地点是中国北京学院路14号3号楼325房间。

次日，我将《开直升飞机的小老鼠》拿给某儿童文学杂志的编辑刘庭华。刘庭华看了连连说好。他将舒克送审后，据说担任二审的康先生看了稿子眼眶湿润了。事后我获悉康先生的父亲是地主，他大概和舒克一样曾经饱受出身不好的煎熬。

掐指算来，舒克已经十多岁了。围绕舒克产生了不少图书、画书、动画片、录像带、VCD、服装鞋帽和文具。由此可以推算出舒克的



◆ ◆

朋友挺多。

如果我的祖父不是富农，我会写出舒克吗？这是坏事变好事的一个典型案例。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世上所有事概莫能外。不必急。

鄭淵浩隨筆



第一次出工作事故

《现代汉语词典》给“事故”下的定义是：多指在生产、工作上发生的意外损失或灾祸。

我第一次在工作中出事故是在 1971 年 9 月 1 日。

1971年7月，刚服役半年的我从教导队毕业，被分配到南昌向塘机场航空兵13机动机务大队二中队军械分队当军械员。我们大队维护的是歼击6型飞机。当时我们这些新兵刚结束业务理论学习，还需要在实践中学习，类似于今天的实习。负责带我的军械师姓舒，湖北人，小个子。我日后给舒克起名字时，借用了他的姓氏。

军械员的工作是维护歼六飞机上的 3 门 30 毫米机关炮、射瞄 7 瞄准具、弹射座椅、照像枪、信号枪、炸弹架和霹雳 2 号空对空导弹。舒

第一燙出工作事故



●皮膚科

第一次出工作事故

见，我又多拿了 10 根筷子。我送饭到机场后，弟兄们发现筷子不够。

“郑渊洁，你拿了多少筷子？”副中队长问。

“60 个人的！”我说。

“你来看看！”

我一看，才醒悟到 50 个人应该是 100 根筷子而不是 50 根。

那天，弟兄们将筷子掰成两半用。

不能说出事故就全是坏事，我就因祸得福了。

9月2日下午，当我乘坐的送饭车准备返回营房时，被陆军拦住了，说是戒严。开车的是老兵，有经验，他对我说，准是毛主席要来，快去看毛主席！他将车停在路边，我跟着他往机窝中的火车站跑。

车站里停着毛泽东的专列，有人向激动的军人们宣布，不要喊万岁，但可以鼓掌。

毛泽东从汽车上下来后，在女服务员的搀扶下朝专列走去，大家使劲儿鼓掌。我没想到毛主席这么老，往常从电影新闻纪录片上看到他接见外宾时红光满面八成是化妆了。毛主席上了一个车厢后，好像是走错了，又下来进了另一个车厢。



第一次看电视

第一次看电视

如今的孩子，几乎从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看”电视，降生后，他们对电视司空见惯。1955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时，视野中只有收音机。我第一次看电视是在1963年。我8岁。

当时我和父母住在位于北京北太平庄的一座部队家属院的7号楼。我家住3单元3层，楼下2层有位叫毕小曼的女孩儿是我在总政第一幼儿园就读时的同窗，我们曾住同一间宿舍。记得我们刚迁入7号楼新居那天，我在楼道里邂逅早年在幼儿园时的校友毕小曼，颇感惊奇。同窗加近邻，走动自然比较多。毕小曼喜欢看书，我记得《小布头奇遇记》就是她推荐并借给我看的。

1963 年的某天下午，毕小曼兴奋地到我家



第一次看电视

因特网的问世，无情地将电视也打入传统媒体的行列，令人不能不产生沧桑感。肯定有一天，因特网也会被纳入传统媒体而遭到世人的冷落。试想我第一次在毕小曼家见电视机时，倘若有先知先觉者当时对大家说这电视机算什么，日后还会有因特网，谁信他？

没有电视台，电视机是一堆废物。电视机的问世，为人类提供了不计其数的就业机会。目前全世界的电视节目从业人员应该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遗憾的是，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和电视台的与日俱增，电视节目的质量却令人担忧。暴力、色情、谎言、欺骗、谬误、愚弄、误导、信口雌黄……充斥电视屏幕。据说美国近年来多次发生的学生枪击同学和教师的校园恐怖事件就有受电视节目影响的因素。

如今，家有电视机，等于花钱在家里安装了一个垃圾出口，一按开关，垃圾就出来了。我们将居所装修得如此富丽堂皇，竟然心甘情愿容忍电视从业人员将他们制造的视听垃圾向我们的家中倾倒。这也是一种环境污染，而且能导致天真无邪的孩子在学校开枪，可见其污染的严重程度。电视机如果传播真理就是天使，如果传播谬误就是魔鬼。

还有那些粗制滥造的电视剧和令人浑身起



第一次看电视

出这么一句：“这既是一场普通的体育比赛，又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大意）。我立刻想，如此一场女足比赛，会有什么不寻常的意义呢？我不能不想到同年5月8日美国战机向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发射导弹的事，可如此奇耻大辱我们能仅仅靠进球来报复美国吗？毕竟足球和导弹的份量有天壤之别。你向我的大使馆发射导弹，我靠向你的球门发射足球来出气甚或寻找心理平衡，实在有阿Q的嫌疑。美国确实霸道，1997年8月7日曾有反美人士炸了美国在非洲的两家使馆，美国竟然只是依靠怀疑就悍然向亚洲的某个主权国家发射导弹实施报复，亮出了谁敢动他的大使馆一根毫毛就让谁不得好死的架式。当时那解说员一语即出，我就替他捏了把汗，假如我们的姑娘输了，照他给这场球赛定的性，我们岂不是等于又被美国炸了一回？说来也怪，自那解说员掷地有声后，电视屏幕上的足球在我眼中就变成了导弹。当中美互射点球时，我竟然产生了幻觉，姑娘们变成了一架架轰炸机，足球变成了导弹，球门变成了各自的大使馆。我祈祷上帝支持我们的导弹击中美国大使馆，打他个断壁残垣。然而现实残酷地击碎了我的梦想。那个早晨我很沮丧。事后我分析，实在是那解说员误导了我，使得我将一场本来普通的体育比赛竟然和美



第一次动手术

第一次動手術

这个世界比较有意思，有的人用刀子夺走别人的性命，有的人用刀子救助别人的性命。前者是杀人犯。后者是外科医生。外科医生是受我尊敬的职业之一。

我迄今为止动过两次手术。第一次是在 14 岁，时间是 1970 年 5 月，病因是小肠疝气，地点是河南驻马店解放军第 159 医院。

我在北京马甸小学读四年级时遭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从此至小学六年级，我们没正经上过一天课。1968年小学“毕业”后，我们班连窝端进北京马甸中学。到中学依然不上课，终日听工宣队训话。所谓工宣队，其全称是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说白了是从工厂里挑一些不善做工的人打着工人



PILU
皮皮鲁

我突然觉得腹股沟部很疼。清晨，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住进贫下中农家后，我一头扎进厕所检查自己的腹股沟部位，我发现那里隆起了一个包，用手碰很疼。这就是小肠疝气。得了这种病，不可以从事重体力劳动。但当时我对此病一无所知。由于该病所处位置的特殊，我没对任何人包括老师说。一个星期的重体力劳动加大了那个包的体积。

一个星期后，我们又拉练步行回城里。由于身患小肠疝气，这次行军是对我的意志的一次严峻考验。我以身体为代价，换取无谓的尊严。今天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一到后沙涧就告诉老师我的身上出现了异常，老师会带我去看赤脚医生吗？会减免我的劳动吗？会在回城时强迫我坐汽车吗？我估计老师说我娇气或“修”了的可能性比较大。

回家后，我立即告诉父母我的身上出现的变化。父亲带我到解放军总参测绘局的门诊部看医生。医生告诉我们这叫小肠疝气，可以手术治疗，也可以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小肠疝气其实就是保养治疗，条件是不能从事重体力活动。

“什么算重体力活动？”我问。



第一次动手术

边说，你看他也是针刺麻醉，他就不叫。

说实话，肚子上的疼还能忍受，耳朵上针灸产生的疼却无法忍受。后来我分析，针刺麻醉的实质是给患者的耳朵上制造另一个疼痛，以分散患者对手术部位的注意力。

我不得不靠默念毛主席语录度过难关，我起码念了 500 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还想起了《三国演义》中的关公刮骨疗毒，我觉得我不比关公的毅力差。

人的忍耐力是无限的。从那次手术后，我就坚信这一点。在没注射任何麻药的情况下，在针刺麻醉没起任何作用的情况下（事后医生也不得不承认），我接受了一次腹部手术。而且等于同时在耳朵上外加一刀。

后来每当我从媒体上获悉某某勇士在同歹徒搏斗时被坏蛋用匕首刺穿腹部时，我都会下意识地产生切肤之痛。

我还算幸运。在我手术几天后，同病房的一位 19 岁的士兵做阑尾手术，自然也是针刺麻醉。医生动员他在手术后自己走向病房，以证明针刺麻醉的高明。并告诉他此举对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有多重要的意义。士兵同意了。



PIPI LU
皮皮魯

第一次动手术

起针刺麻醉时，颇有共同语言。他在1970年的一次针刺麻醉经历如下：他去北京一家大医院拔牙，也是针刺麻醉。正好碰上半信半疑的外宾参观针刺麻醉。牙医看了他的牙后，小声对他说：“你的这颗坏牙比较难拔，我估计你会疼得受不了，这样会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使外宾对咱们的针刺麻醉产生怀疑。你看这样行不行，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我先将你的一颗比较好拔的好牙拔下来。过几天等没外宾时我再给你拔坏牙。”为了祖国的荣誉，师傅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我觉得这位为国争光的师傅一点也不比我们拿奥运会金牌的运动员逊色。

动手术不打麻药和有病不吃药一样，属于歪理邪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第一次经历世纪末

出生于 20 世纪中叶的我，起初对世纪两头概念模糊，毕竟相隔四五十年。虽然说四五十年在宇宙中连一瞬间都够不上，但对于一个人来说，不算短。从我懂事起，19 世纪和 21 世纪对于我都属于极其遥远的时间疆域。

我第一次意识到临近世纪末，源于我在 80 年代阅读的一本书，那书的名字是《1999 人类大劫难》，好像是个叫五岛勉的日本人写的。那日本人详细解释和阐述了 17 世纪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对 20 世纪末的预测，诺查丹马斯预言 1999 年 8 月 18 日人类将面临大劫难。五岛勉在书中极力证明 400 年前的诺查丹马斯的很多预言都被陆续证明了，比如他预言过希特勒的出现等等。必须承认，那本书看得我毛骨悚



PIPI LU
皮皮鲁

然，我当即计算距离 1999 还有多少年。尽管我半信半疑，但我采取了宁可信其有的哲学，我担心倘若我不信，万一诺查丹马斯预言对了，我会吃亏。所谓吃亏，无非是在世界末日之前还为不值得发愁的事发愁。试想如果有一位人士在世界末日的前一天为自己没考上 MBA 或没当上正局而悲天悯人，他亏不亏？他本应在这一天高高兴兴大把花钱才对。

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我相信地球有它的开始和结束，人类也肯定有彻底灭亡的那一天。只不过人人会觉得这一天极为遥远，与己无关。既然人类终有了结之日，总会有人赶上。我相信，不幸赶上的人们在遭受灭顶之灾的前一天，是死活不信明天人类将完全终结的。基于这样的推论，我暂将人类的末日定在 1999 年 8 月，我发现这样行事好处不少。首先我很珍惜时间，当一个人意识到他和他的同类只有区区十几年时光时，他会拿出“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劲头对待时间，将一年变成两年甚至三年。当时我计算出我到 1999 年时是 44 岁，于是我发誓要在 44 岁时做出别人 88 岁才能做出的成就。这样，我就等于活了 88 岁。其次是我决定在 1999 年之前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做违心的事。



《圣经》是这样描述世界末日的：“以后我看见，当羔羊开启第六个印的时候，发生了大地震……天也隐退，有如卷起的书卷，一切山岭和岛屿都移了本位。”

不管怎么说，诺查丹马斯预言的 1999 人类大劫难并未出现，由此也使我对一切“预言”产生了怀疑。人类生活的不可预测性越来越强，世界上有多如牛毛的顶级经济学家，怎么就没一个人预言 1997 年亚洲会爆发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从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采用各种手段包括提高存款利率紧缩银根大力抑制通货膨胀，没想到接踵而至的是来势凶猛的通货紧缩，一夜之间政府又为物价连续下降而坐卧不宁寝食不安。我常想，咱们国家有那么多在媒体上频频亮相被誉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大腕，怎么就没一个人事先给政府提个醒预言有通货紧缩这只恶虎在后边等着我们，？如果有此英明预见，使得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时手下留情，使得通货膨胀同通货紧缩恰到好处地抵消，我们今天也许就不会为扩大不了内需促进不了消费绞尽脑汁了。由此可见，预言和预测往往是靠不住的，世界的变化越来越无章可循。每当我看到媒体上有“著名”经济学家或别的什么专家预言经济或别的什么事，“浪得



虚名”这几个字是非要跑进我的脑海不可的。

现在人们喜欢将浮躁、急功近利、没着没落都归结为世纪末现象。其实月、年、世纪都是人为鼓捣出的数字，本身没有意义。假如人类的老祖宗当初将 200 年定为一个世纪，我们今天能经历世纪末的人就少了一半，悲观情结亦会减少，利用世纪末鼓吹世界末日是当今最司空见惯的事。据 1999 年 7 月 1 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美国有 1500 多个坚信 20 世纪末是世界末日的教派，其中有的预言 2000 年 1 月 1 日计算机千年虫将使世界文明崩溃，还有的预言 2000 年 5 月 5 日是 6000 年来第一次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和地球排成一行，这意味着亿吨冰从南极溢出，致使生灵涂炭。遗憾的是被“狼来了”弄疲了的我，难以再利用这些预言创造人生的业迹。倘若狼真的来了，我已经死而无憾了。当然我希望能有人借鉴我对世界末日预言的做法，乘机做一番事业。成功的诀窍是你必须真心相信某年某月某日是世界末日。

美国专家在分析了 1979 年至 1998 年自然死亡的 270 万人的资料后，得出了女性在生日前一个星期内死亡率特别低，男性在生日前一周内死亡率特别高的结论。这项研究说明男性



第一次经历世纪末

由于性别的压力，习惯在生日前盘点人生，倘若他自认无所建树，就会郁郁寡欢，这当然对生命不利甚至导致其一命呜呼。而女性在生日到来前鲜见有通过盘点人生计算自己的成就的，她们期待的是亲友的生日祝贺和礼物。心情好，即使该死的，也会顺延到生日以后才撒手人寰。专家还发现有成就的人在生日后才去阎王爷那儿报到的比生日前去报到的多 20%。专家认为，这是因为功成名就的人在生日前盘点人生时心情愉快。每年一次的生日尚且如此，100 年一次的世纪末更会有不计其数的人忙于盘点自己的人生。

我一个人写《童话大王》月刊能写 17 年，应该得益于两点：一是我在 30 多岁时相信自己将在 44 岁世纪末时与全人类共同遭遇世界末日，我只能通过加倍写作的方法延长自己的寿命，以事业耄耋之年弥补生理英年早逝的遗憾；二是我在《童话大王》月刊创办之初就有一个梦想，一个人将她写得跨了世纪。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我。

看来，经历世纪末实在算不上是一件坏事。

如今能两次经历世纪末的人大概不多。将来医学发达了，也许我能赶上第二次经历世纪



第一次到大学演讲

第一次到大学演讲

人的一生或多或少总会碰到幸运的事。在千年之交的时候，大概有很多人会趁机盘点自己的人生，看看自己有多少幸运和不幸。我亦如此。不想盘算来盘算去，竟然认为自己此生最大的幸运是没上大学。

我觉得，一个人只要学会查字典，他就可以自己看书学习了。自学的优越性是自觉、自由和自强。被强迫学习的滋味肯定不好受。不自由，毋宁死。倘若一个人只能在老师面授机宜和前后左右坐满了同学的环境中学习，离开学校后他怎么办？现在是终身学习的时代，即使您到了 50 岁，不学习也很快会落伍。而不会自学的人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不能不说是个悲剧。其实，上大学很大程度是上给别人看



PIPILU
皮皮魯

第一次到大学演讲

那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说莫洛托夫同志你错了，那明明是仙女星座。两人各不相让。斯大林在一边说，你们别争了，我让秘书给天文馆打个电话不就一清二楚了吗？斯大林说完对恭候一旁的秘书说你给天文台长打个电话。不想原先的天文台长已被清洗，新台长是内务部的军官，根本不懂星星的事，他一听是斯大林咨询星星，立即派手下乘车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该天文学家深夜听到急切的敲门声，以为自己的末日到了，当即心脏病发作，一命呜呼。工作人员只得去找另一位天文学家。那天文学家听到敲门，再从窗户看到楼下停着汽车，断定是来清洗自己的，这位60岁的科学家当场跳楼自杀身亡。直到清晨5点，天文台长才弄清那个星座的名称，当他往斯大林的别墅打电话时，秘书说不用了他们都睡觉去了。

如果国家主席的夫人都能够被大学生随心所欲地揭批侮辱，普通老百姓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31年后，我在清华大学给学生讲课时先告诉他们我第一次来清华是看批斗王光美。我感慨万分，有如恍若隔世。

听众大都是我的读者，我给他们讲我走过



第一次买汽车

第一波異議車

大约是在 1985 年，一个“有路子”的朋友说他可以帮我办一个汽车驾驶执照，他说现在办比较容易。我特肯定地说，我这辈子不可能有自己的汽车，不用办了，我骑摩托车就很知足了。当时的中国大陆，私人汽车属于凤毛麟角。我的想像力尚不足以想像自己日后会拥有私人汽车。

1987年1月22日晚，诗人高洪波请我去他家吃涮羊肉，同去的还有作家白冰和诗人姜强国。白冰是我的老相识。姜强国是第一次见面，高洪波向我介绍姜时说，这是诗人姜强国，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他太太是丛珊。丛珊在当时是比较红的影星。我告诉姜强国，我同丛珊有一面之交，那是在菲律宾副总统劳雷尔



不绝口叹为观止。如今，他在台湾有两辆汽车。

这两件事激发了我对中国大陆老百姓物质生活进程的想像力，也对自己早晚会拥有私家汽车产生了憧憬和信心。对于我来说，拥有自己的汽车的办法只有一个：努力写作，积累稿费买汽车。

但是，中国大陆汽车的价格对于享受超低稿费的中国作家来说，无疑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天文数字。1988年《童话大王》杂志每期印数是521838本，作为唯一撰稿人，我每期获得的稿费是3475元，相当于1.9%的版税，而当时国际上对于印数在30万册以上的畅销书的通行版税率是15%。1988年我的月工资是76元，因获得副编审高级职称，从当年6月起每月工资增加至122元。

以这样的经济收入水平，从我于1987年1月22日在高洪波家产生了拥有自己的私家汽车的想法起，经过了4年的积累，到1991年，我才勉强获得了买汽车的实力。当时的中国汽车市场是绝对的卖方市场，汽车是紧俏商品。由于经济因素，我只能选择价格最低的夏利轿车，每辆大约8万元。我的弟媳的妹夫的父亲是天津市物资局的头儿，通过这个曲线关系，我获准直接去天津市物资局买一辆夏利轿车。



PIPILU
皮皮屋

第一次买汽车

“我没有转悠，这不是从家里开到车管所来上牌照吗？一点儿弯都没绕。”

“交罚款吧！少废话！”警察不耐烦了。

“我交了罚款，一会儿再碰上警察还得罚？”

“再有警察截你，你就给他看这张罚款单，说已经罚过了，他就不会再罚了。只管今天一天。”

我老老实实交了罚款。

到了车管所，才知道先得领表去所在单位给汽车落户，然后去位于北京远郊区的一家指定验车场验车，验车合格后才能申领牌照。

8月4日，我骑摩托车到单位找到汽车班班长，问他如何将私人汽车在单位落户。班长说我先给你盖个章，说明咱们单位同意你的汽车落户，你再拿着表格先去找管片的交通警盖章，然后再去西城交通大队盖章。班长慷慨地给我盖章后，我问管片交通警在哪儿姓什名谁。他说你出了单位后门往右拐再往左拐再直走在一家保险公司左边有间小房子，小房子后边就是。交通警姓张。

我出了单位后门按图索骥找到那小房子后边，问张先生在不在，屋里的人答复说他下单位检查交通安全去了，你过一个小时再来吧。一个



我明白了，他是采用给轮胎放气的方法走个修车的形式，如果他真修刹车，得拆轮子，很麻烦，弄不好还把车整坏了。这是个有同情心的好人。

4个轮胎都被放过气后，我交了500元刹车修理费。

到了修灯光的地方，我已经毕业了，我对拿着改锥准备拆我的车灯的人说，我直接去交费吧。他愣了一下，稍微尴尬地放下改锥说，那也好。

我交了 800 元灯光修理费。

我们开着发动机不正常轮胎几乎没有气的车摇摇晃晃地重新排队等候复检。再两个小时后，终于轮到我们了。被蹂躏得有气无力的夏利在下午5点时以全优的成绩通过检验。

“到驻场民警那儿去盖正式的检验合格章。”小伙子对我说。

饿了一天没吃饭的我们终于看到了曙光，当我们来到驻场民警办公室时，被告知民警孩子病了，请假提前回家带孩子看病去了。

“别人不能盖章？”我问。

“不能，你明天再来吧！”工作人员说。

“这儿离城里有 30 公里呀！”我说。

“你干吗不早点儿来盖章？他刚走 10 分



PIPILU
皮度爾

第一次买汽车

了两天来验车所受的磨难，然后对他说：“如果你不给我盖章，这车我就不要了，刚买3天就这么受罪！”

我拿起凝结了我无数心血的验车表，准备将它撕得粉碎。

“我给你盖。”民警平静地说。我和弟弟拿着盖了合格章的验车表风驰电掣般往城里的车管所赶，当我在排了 30 分钟队后将一应手续递到领牌照的窗口里时，民警说，还差保险单和停车证明。我问什么是保险单和停车证明。他说新车上牌照必须先到保险公司给车买保险，还得有停车场的停车证明。好在一家居心叵测的保险公司就开在车管所的对面，买保险办得还算顺利。当我赶回我家附近的一座停车场开停车证明时，人家说你得先交 3 年的停车费我才给你开证明，现在你只交了一个月的停车费，如果我给你开了证明，下个月你不在我这儿停车了，我们傻不傻？

我只得预交了3年的停车费。

我拿着保险单和停车证明赶回车管所，窗口里的民警说停车场开的停车证明不行，要去单位所在的交通大队开。我说那你刚才怎么不说清楚？他说刚才我是我吗？我一看确实换了个窗口。我问所有窗口都是一样的规矩？他说当然。

我去单位驻地的交通大队开停车证明，民警



PIPI LU
皮皮魯

第一决翼汽车

服务的1年零5个月中，我为它一共跑了31次修理厂。我不知道是我驾驶它还是它驾驶我。

近来国家常为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绞尽脑汁，我觉得政府应该首先改进消费环境，否则谁敢花钱买车买房？如今能推动消费的，也就剩汽车、住房、旅游和高等教育了。有人套用一句歌词说：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买汽车送给他。如果你恨一个人，你也买汽车送给他；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买房送给他。如果你恨一个人，你也买房送给他；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送他上学。如果你恨一个人，你也送他上学；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动员他去旅游。如果你恨一个人，你也动员他去旅游……

有一年我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售房广告，声称该小区距离天安门 20 公里。当我驱车去看房时，汽车里程表竟然显示为 45 公里。我问售房小姐你们怎么撒谎，小姐振振有辞地说他们说的是空中直线距离。我哭笑不得地说会有在您这儿买房的业主驾驶直升机进城看升降国旗吗？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在北京某座全国优秀物业管理小区购置了一套房子，他看中的是楼的两侧均是绿地，环境安静无噪音，适合写作。不想他入住一年后，物业公司为了创收将楼北侧的绿地改建成停车场，绿地没了不说，整日蝗虫般停在楼下的



PIPILU
皮皮屋

政策随意和消费环境恶劣，是阻碍消费的拦路虎。金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道理谁不知道？可如果花钱的结局肯定是生气和烦恼，甚至花得越多生气越多烦恼越多，谁还敢花？

没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充裕的时间和摇钱树般取之不尽的钱包，劝君慎重买汽车。汽车，气车也。

第一 次 買 汽 車



第一次欺骗组织

我小时候看过的一些电影诸如《在烈火中永生》等，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欺骗组织是叛徒的专利。那时我每每从银幕上看到叛徒出现时，都会咬牙切齿地恨其对组织不忠。每每在银幕上看到艺高人胆大的革命先辈代表人民代表党哐哐数枪处决叛徒时，我就会拍手称快乐不思蜀。儿时的我绝对不会想到，我这样的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革命接班人”，日后竟然也会做出欺骗组织的齷齪行径。

我第一次欺骗组织是在 1976 年 4 月 20 日。

严格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对“组织”一词的界定，我的这篇随笔有高攀的嫌疑。《现代汉语词典》对“组织”一词的解释之一是：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



第一次欺騙組織

而对于我这个无党派人士（我们的标准称谓是“群众”）来说，似乎应该无组织可言。但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大陆，不管你是否加入了党派，“组织”对你来说都是客观存在，你都要对“组织”保持忠诚。套用一句话，叫“全民皆兵”。

1976年3月下旬，我结束了5年的服兵役，回原籍北京继续生存。我到复员军人安置办公室报到后，等待分配工作。一日，百无聊赖的我乘坐公共汽车路过天安门广场时，看到广场上人山人海，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的浮雕不见了，改由无数花圈支撑。我当即下车去看究竟。

置身于天安门广场我才明白，这宏大的场面竟然不是“组织”组织出来的，我感到吃惊。自幼生活在伟大首都北京的我，曾多次直接或间接目睹“组织”在天安门广场组织各种庆典和活动。而此次的花圈和人潮，确是一次非组织行为，甚至可以说是反“组织”行为。对于1949年后的天安门广场来说，这大概是头一次。

成千上万的花圈将人民英雄纪念碑拥满后，再全方位地铺向广场的每个角落。汉白玉的栏杆上贴满了诗歌，诗歌的内容吓了我一跳，按“组织”的标准，全是反革命诗词，其攻击的目标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外，显然还有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甚至常委级的大人物，譬如王洪文，譬如张春桥，再譬如江青和姚文元。这4个人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性建筑”。诗词还有一项内容：为邓小平说话。当时邓小平被组织停职反省。看到这么多人自发地非组织地到“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和“祖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来声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其“标志性建筑”人物，我在震惊的同时感到振奋。我之所以振奋的原因很简单，我的外祖父死于红卫兵抄家时的批斗中，我由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好感。当时我在天安门广场看到这么多人在用这么巧妙的方式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无法克制自己的兴奋。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别说普通百姓，就连国家主席也在劫难逃。据 1998 年 12 月 4 日《南方周末》刊登的一篇文章披露，在文革期间：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体很弱，成天躺在被窝里，并且一丝不挂。他的手里总是握着一根半尺长的小木棒，只要醒着就摆弄个不停。有时两个女护士故意逗弄他，乘他不备，夺下他的木棒，然后再由他夺回去。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从刘的脸上看到一点难得的笑容。”

如此文化大革命，谁不反感？



PIPILO
皮皮魯

第一次欺騙組織

于是处于待业状态的我就天天长在了天安门广场，抄诗，听演讲，目睹别人写血书。我还由此萌生了当诗人的念头。

4月4日，大概由于是星期日，天安门广场的人数达到了数百万之多。花圈如潮人如海，场面壮观。

4月5日夜間，窮凶極惡的四人幫對人民下了毒手。次日，由姚文元把持的媒體顛倒黑白，將天安門事件說成是反革命事件，還指責鄧小平是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后台，由此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此後，北京市開展了轰轰烈烈的清查活動，凡承認在此期間去過天安門的人都要受到審查。

4月19日，我接到复员军人安置办公室的通知，我被分配到北京一家无线电仪器厂当工人。4月20日，我到该厂报到。厂方发给我两张表格要我填写，其中一张是履历表，另一张则是调查表，调查我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期间是否去过天安门广场。

面对这张调查表，我颇费踌躇。从小被教育要对组织忠诚的我，尽管不是组织里的成员，但也要用成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如实填写组织要求我填写的表格。倘若如实填写，对于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中“长（生长的长）在天安门广场”的



不挂地躺在中南海的被窝里以玩弄半尺长的小木棒为唯一的工作。自从我获悉此事后，这个场景从此无论如何再也不能离开我的记忆。我总觉得我的那次欺骗组织和国家主席玩小木棍之间有某种联系。至于这两件事之间有何种联系，以我的智商苦苦思索，还莫说不清。

第一次欺骗组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第一次写皮皮鲁

我第一次写皮皮鲁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那时我 25 岁。

1976 年至 1988 年，我和父母“两地分居”。我在北京，父母在山西省会太原。这期间的每年春节，我几乎都去太原与父母团聚过节。

1981 年 1 月 27 日晚，我乘 187 次火车离京赴太原，那是一列夕发朝至的火车，晚上出发，睡一夜，次日早晨就到太原了。我还记得当时北京至太原的硬卧票价是 16 元。这次假期定于 2 月 19 日结束。去太原前，我决定利用这次较长的假期写一部中篇童话。

我父母家在太原市坝陵桥南街 1 号，那是山西省军区的房产，院子不大，只有南北两栋楼房。北边的楼房是省军区幼儿园，南边是一栋



PIPI LU
皮皮露

第一次写皮皮鲁

3层小楼，每层两户，一共6家。我家位于3层南侧。这套房子有5个房间，一个厨房，一间储藏室，一条走廊，一间厕所。

我到家后的最初几天，除了组稿就是看电影。当时我借调在北京一家刊物做编辑，外出自然身负组稿任务。到太原的次日上午，我就到山西作家马烽家向其约稿。由此可见我在假期也没忘了工作。当天下午，我和妹妹郑欣在军人俱乐部看电影《最后八个人》，如今我已记不起这部电影的任何情节了。我家离军人俱乐部很近，属于近水楼台的咫尺距离，于是，看电影就成为那个假期我的主要娱乐活动。那些天看的电影还有《情天恨海》、《永恒的爱情》、《雁归来》和《法庭内外》。这些电影如果今天再看，我估计可能“惨不忍睹”，是年代的原因吗？《魂断蓝桥》怎么就能经久不衰？

2月5日是春节。太原过春节的风俗是串门拜年。从正月初一起，人们就像着魔似的轮番往自己认识的人家跑，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家家都是走马灯式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场面全都一样：见面拜年寒暄，主人说请坐请吃瓜子花生糖果请抽烟请喝茶，客人说不吃不吃刚吃过不喝不喝刚喝完，话还没说圆乎，又来一拨客人。于是老客告辞，新客落坐，重复刚才的内容请坐请吃请喝



PIPILO
ERR

第一 次 写 皮 皮 鲁

名字有所区别，应该有滑稽的成分，同时很容易被读者记住。由于他是中国孩子，他的姓氏必须是中国姓氏。我给他起了大约七八个名字。在11点时，我从中选定了“皮皮鲁”。当时中国大陆有位将军叫皮定钧，我由此断定“皮”是中国人的姓氏。我对皮皮鲁这个名字很满意，他既是板上钉钉的中国姓氏，全名又与普通中国人的名字有所区别，容易引起孩子们的好奇。

2月10日是正月初六，疯狂拜年的太原人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家家终于清静下来，我家也不例外。我家的客厅和书房二合一在一间房子，写字台亦在这间屋子里。2月10日下午，我趴在太原市的这张写字台上开始第一次写皮皮鲁。作品名称是《皮皮鲁外传——写给男孩子看的童话》。我写中篇作品有个规律，刚开始写时进度很慢，一般一天只有几百字，越到后边写得越快，一天甚至能写到近两万字。2月10日下午，我只写了数百字。

2月11日，我进入了状态，写了9000字。我的写作属于即兴写作，写前虽然也有“构思”，但那构思与作品完成后的故事情节大相径庭。从这天上午起，皮皮鲁开始拽着我走，上天入地，纵横捭阖，直累得我气喘吁吁。

2月12日又写了9000字。这时的我已是身



不由己，被动地跟着皮皮鲁走。

2月13日，我写了1万字还欲罢不能，直至感到恶心，四肢无力才放下笔。

2月14日，我发烧了。服药休息一天，晚上退烧。

2月15日，我完成了《皮皮鲁外传》，共计3万字。

至此，世界上多了一个叫皮皮鲁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人青出于蓝胜于蓝，如今知名度大大高于我。有时我偶尔参加社交活动，朋友将我介绍给别人，当朋友说“这是郑渊洁”时，别人无动于衷。可当朋友补说“皮皮鲁是他写的”时，对方的表情立即弃暗投明反应顿时强烈，弄得我又喜又忧。

从那以后，我以皮皮鲁为主人公写的童话已逾百万字。现在，每个星期有数以百计的读者朋友给皮皮鲁写信，他们将心里话向皮皮鲁倾诉，还把自己的照片寄给皮皮鲁。在中国的孩子中，皮皮鲁可能是拥有朋友最多的人之一。我为皮皮鲁高兴。

大约从 1984 年起，媒体送我一个“童话大王”的称谓。说实话，我不喜欢这个称谓。我喜欢的称谓除“郑渊洁”外，还有“皮皮鲁之父”。



PIPILU
と皮投書

到了生育年龄恰逢国家推行“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城里人，用笔生孩子是一种既不违反基本国策又过足了多子女瘾的妙计良方。

第一 决写皮皮普



后 记

我一共写了 100 个第一次，属于随笔。有《第一次打官司》、《第一次交异性朋友》、《第一次为人父》、《第一次考试不及格》、《第一次闯禁区》、《第一次养狗》、《第一次被盗版》、《第一次逃学》、《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被炒鱿鱼》、《第一次开汽车》、《第一次受审查》、《第一次主持广播电台直播节目》、《第一次教育老师》、《第一次探监》、《第一次喝酒》、《第一次住宾馆》、《第一次主持电视节目》、《第一次写作》、《第一次向商家索赔》、《第一次见死人》、《第一次驾车追尾》、《第一次出国》、《第一次买房子》、《第一次上学》、《第一次写第一次》等等。这些随笔的总名称为《郑渊洁的 100 个第一次》，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它们陆续刊登在我的作品专刊《童话大王》月刊上。这次出版单行本前，编辑告诉我，出版社发行部的专家



PIPI LU
皮皮鲁

说，书价超过 20 元，就不好卖了。我当然希望自己的书好卖。于是我削足适履将《郑渊洁的 100 个第一次》的前 38 个第一次编成这本定价在 20 元以内的书投石问路。如果没人待见，我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谁叫咱运气好，碰上了市场经济。

郑渊洁

2001 年 7 月 26 日写于北京皮皮鲁城堡

著
记



☆法律如果有弹性，就成了怂恿犯罪的酵母。

☆才不可用尽，用尽招灾。

☆双重标准是强者的专利。

☆最没出息的写作是死守文法。

☆不是有声带就有发言权。

☆如今拿书当书的人越来越少，这缘于现在不是书的书越来越多。

☆白条是政府工作人员伪造的假币。

☆人生的目的是墓地。

☆合理的理多，合理的事少。

☆别看城里的地面不露黄土，其实处处是陷阱。

郑渊洁作品精彩语言摘录



用一种方法教 50 个学生。

☆不吃亏的人最吃亏。

☆一个民族如果把浪费当面子，她在地球上将越来越没有面子。一个民族如果将节俭当面子，她在地球上将越来越有面子。

☆对亲人最大的爱，是看好自己，别惹事。

☆明星不接受采访看不出弱智。

☆学不会不是学的人笨而是教的人笨。

☆一本书不论从哪页看起，5分钟后还不能吸引你，请毫不犹豫地扔掉它。

☆人能承受失败，不能承受成功。人是只能共苦不能同甘的动物。

☆有学历的傻子比没学历的傻子多。

☆养生之道的真谛不是吃什么，而是不吃什



么。

☆伟人把复杂的道理弄简单。小人把简单的道理弄复杂。

☆越没钱越要脸。越有钱越不要脸。

☆国家越富越节俭。国家越穷越浪费。越节俭越富。越浪费越穷。

☆人生没有公式。成功的人生都是独辟蹊径。

☆记住恩人。忘掉仇人。

☆有的人因为蹲监狱而当总统。有的人因为当总统而蹲监狱。

☆正确的选择往往尾随在足够的考虑时间之后产生，就像十月怀胎才能降生饱满的婴儿。

☆在这个地球上，最不善解人意的是人，最善解人意的是狗。从品质上说，很多人其实是



☆奋斗人生的诀窍是经营自己的长处。经营自己的长处能给你的人生增值。经营自己的短处必然使你的人生贬值。

☆有钱的人怕别人知道他有錢。没钱的人怕别人知道他没钱。

☆读书是一种社交行为。足不出户就可以和世上的智者交往。

☆先天获得才能不需要你付出任何努力。如果你继续不努力，后天丧失才能更容易。

☆抽烟是法律允许的吸毒。卖烟是法律允许的贩毒。

☆不该挣的钱千万别挣。挣了会使你失去更多的钱。

☆表决是谬误的通行证。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郑渊洁作品精彩语言摘选



☆什么是名人？名人是给普通人的生活提味儿的佐料。名人实质上是普通人的奴隶。

☆中国人说中国话没人觉得了不起，中国人说外国话就会被人认为了不起。干人事的人不容易出名，不干人事的人特容易出名。

☆作为民族，没有独特，就没有平安。作为个人，有了独特，就有了危险。

☆所有的人都是井底之蛙，区别在于井口的直径不同。

☆比一事无成更痛苦的，是万事如意。

☆天才无视文凭。人才轻视文凭。蠢材重视文凭。

☆宇宙是一个谜。一个有谜底的谜。现在还没人知道谜底。人类也是一个谜。一个没有谜底的谜。人人却以为自己知道谜底。

☆ 国家与国家之间，只有一永恒不变的利



PHILU
と皮皮糖

益，没有永恒不变的友谊。人和人之间，只有一成不变的血缘，没有一成不变的关系。

☆其实每个人在心里都怕别人，超人伟人强人也不例外。

☆人类之所以能统治地球，就因为他们让不动的东西动了。

☆在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和魅力的，是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人类在地球上的不同空间不同时间前赴后继忙忙碌碌不遗余力干着同一件事，从生下来就想比别人活得好，到死却都觉得活得不如别人好。

☆长脑子应该想别人没想过的事。长嘴巴应该说别人没说过的话。长腿应该走别人没走过的路。

☆年龄小不是错误。

郑渊洁作品精彩语言摘录



☆忘记自己的相貌的人是幸福的，不管你长得好还是不好。相貌只是区别人与人的标志。如果把它当作财富，你的人生就变成了一次投机取巧的无谓游戏。如果把它当作包袱，你的生命历程就变成了一次重负下的艰难跋涉。

☆阳光和阴影是上帝派到人世间的双胞胎。

☆天外有天。做事一定要留有余地。

☆世界上的东西没有大也没有小，没有多也没有少，没有富翁也没有穷鬼，就看你和谁比了。

☆一般来说，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自己都不是龙。

☆有的人人生像酿酒，时间越长越香醇。有的人人生像积水，时间越长越浑浊。

☆无形的东西最实在。有形的东西最虚无。

☆朋友和亲人之间的每一次见面都可能是最



● 度度度

鄧劍浩作品精彩語彙摘錄

后一次相逢。每一次分手都可能是永别。

☆地球是行駛在宇宙中的泰坦尼克號。

☆看见了和不喜欢是孪生兄弟。看不见和喜欢是孪生姐妹。

☆在这个地球上，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一个比一个显得忙，忙着得到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就失落就急。得到了就先得意后空虚。得到的越多失去的越多。得到的越少失去的并不少。

☆没有军队可能就没有和平，有了军队可能就有了战争。

☆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的最佳手段是推行廉
政。

☆鼓励能将白痴变成天才。

☆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什么都不怕。知道得越多，怕得越多。



郑渊洁作品精彩语言摘录

☆当官的品质富有，老百姓的钱包才能富有。当官的品质贫穷，老百姓的钱包肯定贫穷。

☆腰缠万贯是另一种穷。一贫如洗是另一种富。

☆维护世界和平靠枪不靠笔。

☆人咬人比狗咬人凶多了。

☆对你最苛刻的，往往是你的朋友。

☆虚虚实实做梦。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忠忠实实做伴。扎扎实实做学问。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深刻足迹，大都是在泥泞的道路上留下的。

☆在人们眼中无比重要争夺不休的地球其实只是宇宙里的一粒芝麻大的连自己发光都死活办不到的星星。在这颗星星面前，世界首富只不过是一只拥有许多一辈子也用不着的钱的蚂蚁。



[⏮](#)
[⏪](#)
[⏩](#)
[⏭](#)
[⏮](#)
[⏪](#)
[⏩](#)
[⏭](#)
[⏮](#)
[⏪](#)
[⏩](#)
[⏭](#)
[⏮](#)
[⏪](#)
[⏩](#)
[⏭](#)

☆知识能给人插上翅膀，也能给人戴上脚镣。

☆最好的报复是让冤家看到你生活得越来越好。

☆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不管说得对还是错。何况，今天对的，明天可能就是错的。今天错的，明天可能就是对的。

☆兴趣是成功的第一动力。

☆人民听政府的，越听国家越穷。政府听人民的，越听国家越富。

☆人类在 20 世纪：个体寿命增加了，整体寿命缩短了。

☆真正有理的事是不需要找理由的。

☆注重接待规格的人最没规格。

☆“理屈词穷”已经过时。如今是理屈词富

郑渊洁作品精彩语言摘录



IPILU
皮皮屋

郭沫若作品精彩语言摘录

☆不吃亏的人绝对占不到便宜。

☆什么事都可以勉强，唯独婚姻不行。朝夕相处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境界：融洽的朝夕相处是天堂，违心的朝夕相处是地狱。

☆时间是雕刻刀，在所有人的脸上雕刻皱纹是它的技能和嗜好。

☆行賄的本質是嫖娼。受賄的實質是賣淫。

☆只有一件事是所有人类成员都做的：从出生起就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没一个人能例外。早死的未必吃亏，晚死的不一定占便宜。

☆真正值得怜悯的不是乞丐，而是没有童心的人。

☆空调和暖气是人类对自然的不屑一顾。自然还给人类的一个厄尔尼诺。

☆教育的真谛是敢于和善于否定权威和前人。

